

/ 演講紀實

胡哲豪：塗鴉實踐
蔡明亮：賣票人生
王志弘：文化治理
謝一誼：濕市場的
全球摩擦

/ 封面故事

陳虹穎 劉家儀
流 人 林傳芃

/ 教師動態

王志弘 張聖琳 陳良治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城鄉通訊

NO. 23
MAY 2021
春季號



香港專題報導：

甌隆甌罅睇香港



▲位在港鐵大埔墟站旁的人行隧道，是反送中期間，香港規模最大的連儂牆之一，晚上總有許多市民停留，表達對抗爭的支持。攝影&說明/洪與成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創辦人 | 畢恆達

發行人 | 陳良治

指導教師 | 王志弘

本期主編 | 葉庭瑜

文字編輯 | 姚麗金 葉庭瑜 楊浚宇 傅裕

美術設計 | 傅裕

封面照片 | 洪與成

封底照片 | 洪與成

編輯室報告

為期一年的《城鄉通訊》編輯工作即將告一段落，交棒給下一屆編輯，很感謝讀者朋友們不吝指教。一年的過程中讓我們了解，維持一份刊物的運作並不容易，但這更是難得的經驗。話語即權力，編輯工作從構想、邀稿、訪談、撰稿、校正、出刊，甚至是出刊後，都需要步步為營，謹慎地處理每個細節。若有不周，也望讀者朋友們諒解。最重要的，謝謝王志弘老師不厭其煩的叮嚀與指導，讓每一期的《城鄉通訊》都能順利出刊。

不少城鄉所同學們對於香港近年的抗爭運動有所關心，在本期的「甌窳甌窳睇香港」香港專題報導中，我們也試著探究在越來越令人窒息的香港，抵抗的力量如何持續進行？COVID-19 對於運動或市民來說，帶來了什麼困境與機會？這個專題裡，陳虹穎學姊從「照護」角度出發，重新理解香港的城市密度；並以虛構廣播節目的形式呈現連儂牆報導，希望帶給讀者親臨現場的感受。本期的校友涸流專版，則配合香港專題，由林傳芄學姊分享香港本土農業及其在疫情之下的轉變。另外，我們也收到了兩篇來自香港的投稿，提供了香港視角的日常切片，也感謝洪與成同學提供了抗爭現場的影像，這些內容都難能可貴。

近期在城鄉所內舉辦的演講，我們收錄在本期的演講實紀專版中。繼上一次的城鄉違建專題報導，胡哲豪博士生為我們帶來了禮納里永久屋部落的一手資料，他關注於「災難塗鴉」的議題，說明了塗鴉所傳達的特殊訊息。另外，很榮幸地，蔡明亮導演在三月時於畢恆達老師的《電影與空間》課程中，與我們分享他從製作、拍攝到賣票的電影工作內容，以及他對於主流電影市場的抵抗，實在精彩。王志弘老師在台藝大藝政所的《文化治理：邁向生活網絡與基礎設施化》演講，詳盡地呈現了王老師長年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系譜與脈絡，非常值得一讀。除了上述，謝一誼博士也在黃舒楣老師《市場、城市、交換流動中的城鄉鏈結》課程上分享了她對於「濕市場」在當今全球疫情大環境中遭受摩擦與爭議現象的看法，以及台灣本土傳統市場實際的生存現況觀察。

在本期現任教師報導的篇章中，我們則邀請到了三位老師談及研究及教學近況。陳良治老師的台灣產業轉型研究與特別的「台灣製酒業」研究值得關注，陳老師也與我們分享了碩一實習課的經驗，以及接任城鄉所所長之後的忙碌工作。王志弘老師除了與我們分享近期研究以及論文指導的近況，也談了即將休假的計畫，並且分享了一些好書和學習方法。張聖琳老師則從不久前發表的文章《以地方為基礎的鄉村教育行動可持續發展研究：台大知識緣與坪林的十年陪伴關係》中，與我們談論坪林地方發展與培力過程的心得體會。

最後，再次的感謝讀者朋友們對於《城鄉通訊》的支持，這份刊物的長久維繫，除了指導老師與編輯同學們在行間字裡的來回穿梭之外，也很需要讀者的閱讀、關注與參與。相信接下來的城鄉通訊，會愈來愈精彩可期。

2021.5

城鄉通訊編輯室

| 目錄 |

002 編輯室報告

005 封面故事

- 005 香港專題報導：甌窿甌罅睇香港
- 007 陳虹穎：以「照護」重新理解香港的都市密度
- 011 劉家儀：連儂牆存亡記
- 025 劉家儀：疑幻疑真的Google連儂牆
- 029 流人：香港人的走難日常
- 031 林傳芄：香港農業話你知

035 演講紀實

- 035 胡哲豪：莫拉克災後重建村的原民塗鴉實踐
- 039 蔡明亮：從戲院到美術館的賣票人生
- 044 王志弘：文化治理：邁向生活網絡與基礎設施化
- 053 謝一誼：濕市場的全球摩擦：台北雙連市集的遭逢與跌撞



▲連結旺角東站與新世紀廣場的行人天橋，欄杆綁著寫有「香港加油」，以及「831 R.I.P.」的布條，紀念太子站襲擊事件。攝影&說明/洪與成

057 教師動態

057 王志弘：閒聊最近

060 張聖琳：地方與「知識緣」

064 陳良治：從產業群聚演化到後進產業者的品質追求

香港專題報導： 甌窿甌罅睇香港

主編 葉庭瑜





又一次新春，天氣日益晴朗，但這樣的春光卻非均質地遍灑在每一方土地上。當台灣的學生享受著疫情漸緩帶來的放鬆、追趕著論文進度、踏實於每日生活時，海洋彼端的那個城市卻像是失去了聲音，只有零星消息偶爾閃爍於新聞節目一隅——被他人之口以他種語言陳訴。香港，承載著獨特語言、文化、經濟地位與歷史背景的美麗城市，正像坍縮前的白矮星一般無聲而劇烈的燃燒，一年半前的區議會選舉大勝，看似得到階段性勝利，很快地卻遭逢新冠肺炎疫情，香港在政府控管疫情的「合理」要求下被掐住了咽喉。不得群聚、選舉延後，乍看之下頗具正當性，事實上限制的卻只有人民，統治者的刀斧一刻也不曾移開。如此，有關北京與港府動作的報導一次比一次令人灰心，來自香港的音訊卻越來越少，上次親耳聽到粵語是什麼時候？那些香港朋友如今是否尚且安好？

帶著這些關心，本期《城鄉通訊》為各位讀者帶來香港專欄，雖然沒辦法並肩走上街頭，但至少以不同的方式讓香港的片刻能再現於妳我眼前。本次專欄融合邀稿與校友訪談，首先感謝城鄉所畢業校友、英國德倫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後研究員陳虹穎學姊，在百忙中抽空與《城鄉通訊》讀者分享她研究計畫中有關香港坑爭的觀察。此外也請到 R05 級林傳芄學姊，和我們談談少見的香港農業主題，本土耕作者如何在疫情下找到出路，本土農業又面臨了哪些困境。並收錄廣播節目《城鄉 On Air》與香港民主運動參與者劉家儀同學的連線實況，從這次反送中運動中令人矚目的連儂牆切入，擴及到整體運動的歷程，也帶來香港的勉勵與盼望。以及最後兩篇來自香港的投稿，講述走難成為日常的香港生活，以及只從在於時空片段的魔幻 GoogleMap 連儂牆。

標題「甌窿甌罅」為粵語「到處鑽」之意，就算是很小的地方也鑽進去看，本期專欄帶領讀者從各個角度看見香港，就算有如一片便利貼那麼小的物品，也能從中看見屬於香港的眾聲喧嘩。

◀劉家儀攝於2014年雨傘運動，警察清場後只剩下這幅標語，諷刺地預告了香港的未來：確實這只是個開始，最黑暗的時期，遠遠尚未來臨。但清得了場，清不了民心，極權壓迫下的抗爭也正要開始。

以「照護」重新理解 香港的都市密度

R94 級系友 / 英國德倫大學地理學系擔任博士後研究員 陳虹穎學姊 訪談

採訪 葉庭瑜

與陳虹穎學姊的相遇是意外驚喜。去年末，在人類系聽到學姊演講，深深被學姊談起田野的熱切所感動，讓人在寒冬中能仍感受到和煦暖意。恰逢本期《城鄉通訊》專欄主題香港，是她曾進行田野調查之地，便邀請她與讀者分享她在香港的田野觀察。

研究關注：都市密度

虹穎學姊目前在英國德倫大學地理學系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她所參與的研究團隊，目前正執行六個亞洲高密度城市的比較研究。她們的團隊計畫有一部分在香港進行。2019年四至六月間，她在香港進行住宅與街市經濟的田野調查。時值反送中運動火苗初現，日常一切尚未被專制政權蹂躪踐踏。不同於以往既有社運組織引領，這個社會大眾自發性展開的運動，重新藉由網絡互動與自發性行動定義，打破了許多既有組織方式、結構。高度變動不穩的有大台運作，讓許多人不解與質疑，運動的焦點數度分散至路線爭論，抗爭者開始為彼此貼標分類，例如「勇武」、「和理非」。各種行動的有效性，也經歷高濃度、快速反饋與攻擊。虹穎談到，思考自己的「異鄉人」身分與研究工作，決定運用目睹運動萌芽過程的時間點與身分特性，以書寫紀錄其他種被忽視的現實：撇開過熱的路線之爭，我們也許可以找尋，是什麼樣的互動質地（而不只是共同的敵人或目標），讓異質多樣的人們，在運動中發生連結，走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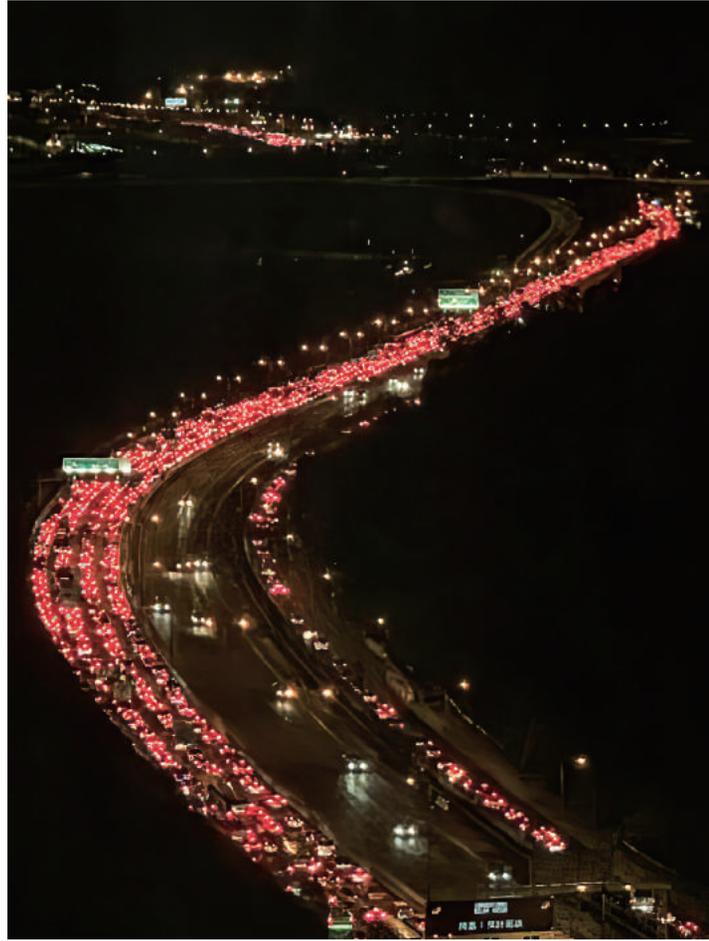
說穿了，這是談人們如何為「團結（solidarity）的基礎」開源。但我好奇，這與原本研究計畫的核心概念「密度」有關嗎？她說，密度，一般聯想到的是物理性的、一定空間中存在的份量或擁擠度。談到高密度城市，我們聯想到的是人口或建築密度。在發展「密度」研究中，一個概念性挑戰是：如何展現都市社會中，人際關係、社交網絡等的關係鬆緊？此時，密度的概念不再囿於肉眼可見的質量；而是一種因人與人之間的照護（care）而產生的「質地」。真正讓人有所行動的，不見得是政治信仰。許多時候，反而是直覺性的感覺或情感。此外，「行動」的異質形式與內涵中，相互「看顧」的密度，也許是使這場運動產生渲染力、甚至能在政治高壓下持存的主因。

「照護」（care）多大程度能體現這場運動的自發性動員呢？虹穎以專制政權下的大規模集體動員相比，指出「看顧」的政治是立基於平等、經常非特定對象的相互性（reciprocity），體現香港反送中運動浪潮中，社會性動員的邏輯差異。比如最近的緬甸軍事政變，軍隊行為也是集體動員，它運作的機制與邏輯，恰恰是關照的截然對立——是斬除、是壓制，而非生產社會連結。自發性的照護與其所觸發的情動政治，或許正是民主運動中的關鍵；而這些社會過程中，情感流動可能透過物質或非物質媒介。她接著以「移動」、「呼吸」與「音景」舉例，談人際照護如何形成另一種物質 - 非物質共同織就的都市密度。

移動

移動是大家最習以為常的日常事件，無論是上班、上學、或者趕赴抗爭集會地點，都經常需要大眾交通工具。她談到，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市民行動者們常搭乘地鐵趕往現場。然而，搭地鐵這件事背後有雙重隱憂，一是「八達通卡」留下的數位足跡紀錄、集會時穿著的黑衣，恐成為未來政治檢控證據；二是隱性的階級門檻，地鐵票價較高，頻繁的動員次數必然造成學生與其他經濟弱勢者的負擔。有些市民自發性地開始在售票機上放置零錢與衣服，讓有需要的人自由取用。這些為不特定個人的便利與安全著想的自發性舉措看似細瑣，但具渲染力。金錢與衣物媒介，當下彌補了經濟階級落差，展現了「移動」的都市照護政治的一種可能。

另一個例子是在網路上瘋傳的香港版敦克爾克大撤退—2019年9月1日，香港民眾發起「和你塞 2.0」行動，試圖藉由癱瘓前往香港國際機場的交通路線來表達抗議。不過當日傍晚起，港鐵宣布暫停所有機場往來的車次，機場成為孤島，抗爭者只能徒步離開。緩慢的步行速度、直升機開始盤旋在撤離人們的頭頂，無疑增加了被捕的風險。此時許多香港有車階級，即便預知將經歷長時間堵塞，冒著可能被捕的風險，仍前來「義載」。「自願塞車」的熱心司機們亦深知，這些接送不僅是時間成本，也含括政治風險（例如：載到偽裝成抗爭者的臥底警察）。但他們還是付出自己對另一個陌生人的關懷，面對複雜風險，卻選擇了單純交付信任的行動。這類交付信任的行動，借用韓麗珠在《半蝕》裡的隱喻，是關於他們與腳下那片土地的連結，寄盼這片土地與其上人們生存的樣子，是一次次的民主化練習。而這會是對抗專制政權撲天網羅的最佳武器。



▲2019年9月1日香港版敦克爾克大撤退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V3yLLQ>

呼吸

另外兩種照護的焦點 / 媒介，是關於呼吸與聲音。虹穎學姊談到研究計畫裡選擇以身體感作為研究方法。乍看之下，呼吸與聲音似乎對應傳統的五感，卻又不僅僅是聽覺與嗅覺。她認為生活中的介質其實也承載情感，那不只是可量化的分貝與氣味。對呼吸的關注，源自於她在深水埗-旺角一帶暫居兼做田野的經驗，那裡許多劏房空間狹小，房裡就算有窗戶，也未必能打開。夏日溽熱，更仰賴冷氣交換室內外氣體。這預設著：外部空氣流動，無論霧霾或空汙，必定比室內空氣好些。然而抗爭越演越烈，香港警方開始在住宅密集區域使用催淚彈，城市變成了戰地。在她的田野訪談過程中，許多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來港，常選擇落腳此區域。但此時這些蝸居在劏房裡的新移民們反而成為第一線受害者。就算居住密度極高，劏房結構狹窄封閉，又無法阻絕左右噪音干擾，空間本身即製造緊密的疏離——現在，還要加上有毒的氣體。不論打開窗戶或冷氣，引進的不再是相對新鮮的空氣。伴隨著隔鄰住戶烹飪油煙，以及催淚瓦斯投放後逸散於空氣中刺鼻毒氣，連呼吸都逼得人無處去。

田野期間，她參與了深水埗一帶的社區修繕志工隊的每周出隊。藉由社區修繕作為人際組織，這些移民與在地港人間發展出以社區修繕互助為主的、新的共同身份。但當安穩的住宅區被催淚瓦斯氣味壟罩，香港／中國的地緣關係緊張，新移民們的生活適應挑戰，不再只是狹窄劏房帶來的物理區隔與連結斷裂，政府軍事化的鎮壓行動無疑加劇以語言族裔為界的標籤與距離。街頭瀰漫的催淚瓦斯毒氣，一如以氣溶膠傳播的 COVID-19 病毒，對於生計與生命的威脅一視同仁，與持有哪一種護照毫無關係。物質性的空氣承載了看不見的情緒，地緣政治的緊張，也體現在空氣的質變中。

呼吸的照護政治有許多例子，例如當公共運輸滿是瓦斯殘留痕跡，市民自主組成小隊去清掃，後續又有許多自發性的研究小組前去測試殘餘量，試圖檢測、記錄環境毒害狀態。又或者是那張妳我都熟知的照片——在街頭以網球拍揮擊瓦斯彈的抗爭者。在她的文章“Densities of Care”¹中也提到，面對港警往抗爭者群眾發射的催淚瓦斯，市民們快速組織，以各項權宜替代的日常物品——鍋蓋、水瓶、三角錐之類——撲滅瓦斯。她說，其實人們一開始不見得樂意參與。但隨著戰線拉長，每個人開始發現，在這個運動中可以找到自己貢獻之處。從運動初期，她說，自己無數次都覺得情勢緊張嚴峻，似乎已無可挽回，但回頭來看，在每一次勢力資源差異極大的對峙下，之所以能夠突圍，是因為這場社會運動的力道在於「照護密度」的感染力。



▲抗爭者以球拍擊回催淚瓦斯。圖片來源：路透社/ <https://reurl.cc/5o01eV>

¹ 資料來源：Chen, Hung-Ying (2020) Densities of care, *Urban Geography*, Vol. 41, Iss. 10, pp. 1302-1309. <https://doi.org/10.1080/02723638.2020.1850045>

音景

談到音景，虹穎說開始察覺到聲音作為情感密度的媒介，起源於 2019 年四月第一場遊行。當時氣氛延續雨傘運動後政治檢控的低潮，沒人知道誰願意去，身邊友人大多判斷動員不易。她以為那只會是一場小規模遊行，和友人們一起走到金鐘再返回就結束了。大家都沒想到，縱使已經超過解散時間，回去的路上，與不停湧入的人潮交錯。正要離開的人們看見後有新加入者，回報以熱烈掌聲歡呼，形成鼓舞的音浪。人與人的意志，在那一瞬間，以音浪銜接。混沌不穩的時代下，人人都在問希望在哪裡？每個人的自體製造，也許是答案之一。

音景構成的都市照護政治，也發生在城市邊緣（新界）的高層住宅間。面對集體記憶中的香港變調，人們以一次次集會、遊行對應。但集會遊行現場畢竟是短暫事件。參與事件現場有種種門檻，無論是時間、身分或可及性。這些集會現場讓人能看到群眾和「同伴」，能感受到眾聲喧嘩與力量聚散的張力。但回到家後，心與意志也再度收納受限在一個個水泥盒子裡。對住得遠的人來說，大多時候只能獨自消化時代性的焦慮孤單。音景製造的起頭，似乎是某個高樓公寓的住戶因為煩悶，朝窗外大喊口號。當有人大喊「五大訴求」，便會有無數個聲音回應「缺一不可」，或是更簡單的「香港人」「加油！」。漸漸地，卻變成不同高層社區間的約定俗成，在每晚某時段（因地區而異），一起唱歌或喊口號，成為一種日常的身體行動。當音浪迴盪樓與樓之間，鄰里間的聲音地景取代了電視傳來的無機質聲響，藉由音景製造，傳遞共同意志 / 心意，為看似疏離的水泥叢林拉起立體而隱形的連結。

結語：透過日常實作記住如何信任

分享了許多小故事後，虹穎學姊仍補充，這些短篇寫作，目的不在於美化或浪漫化抗爭中的人際互動。不諱言，在大型社會運動過程中，當然免不了各種爭議，特別是與民主化理



▲金鐘 / 圖片來源：陳虹穎攝影

念相違的實踐。尤其，這場運動的行動結構相對扁平化、高度動盪，各種人際合作與聚散過程中，難免有人傾向貶抑他人行動策略、爭論孰高孰低、製造個體抉擇中的集體道德壓力，這些想要壓制他人、論功分級與內部失衡的張力，可能會裂解原有的人際照護，讓結盟的根基產生裂縫，甚至崩解。在她眼中，「照護的密度」是眾多抵抗動能中，跨越各異階級、年齡、性別、種族、職業身分與立場的接著劑，也是使集體力量如水穿石的核心。

面臨急遽險峻的政體轉變，即便無人能即刻擋下極權的巨輪，幾乎每個人都無法避免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被逼著決定：是該明哲保身？還是不該自設紅線？她認為，這次運動不僅鼓舞了人們從個體到集體的身體感的想像與可能，也激發香港社會對北京壓迫的手作出社會性回應。更具體地說，與其說身體感是抗爭的動力或方法，不如說已形成現下香港社會難以抹除的一種集體記憶。這些身體記憶同時是這片土地的，即便被強制格式化，放長遠看，也只是某段瞬間。而一個社會的民主化想像，不只是寄予於高強度的對抗，更是長遠來說，是關於人與人之間，如何重構（不）信任的互動秩序、基礎與質地。這份信任，從我們討論的種種身體實作中可窺見一角。她的香港書寫，提供我們一種可能的分析視角，一種即便獨身在黑夜密林中，也能穩步前行的能力。



On Air

連儂牆存亡記

台北香港即時連線

主持 城鄉 On Air / 對談 劉家儀

圖片來源：劉家儀

放送！放送！

予全臺灣聽著阮的心聲

放送！放送！

予全世界會記著阮的名

放送！放送！

予正義佻和平趕緊來到遮

這個理想一定愛你知影……

城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城鄉 On Air，今天的香港特別報導「連儂牆存亡記」很開心邀請到香港社會運動者、也是城鄉所同學的家儀與我們連線，從對連儂牆的觀察來看背後整體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經過。歡迎家儀。

劉

哈囉，打給賀。

城

好的，在請家儀分享連儂牆的故事之前，先聊一下香港近況吧。最近發佈所謂「愛國者治港」的決定，對未來的選舉有什麼影響？而在《港版國安法》之下，聞名於世的香港 64 燭光晚會，是否會被熄滅呢？

劉

其實……我不寄望香港短期內會再有選舉了。因為愛國者是沒有標準的，只是一種審查的手段，當權者不想見的，是香港跟國際的連繫；不想聽的，是討論本土或批評政府不公義等議題；不想出現的，是推動民主的行動，因此就以「勾結外國勢力」來扣帽子，或抹黑異見者為「外國指示的港獨份子」，甚至不斷透過紅媒恐嚇香港人，任何令政權不爽的言行就是不愛國了，要我們必須接受共產黨是最高統治權力，愛國的意思其實就是愛黨啦。所以，香港現在選舉已經名存實亡，表達自由更是岌岌可危。像中共也宣稱自己有選舉一樣，妳會相信嗎？中共就是想把中國大陸那一套制度搬到香港，所以我覺得就不用再有期盼了。

近來情勢確實越來越緊張，個人而言，如果身上被警方發現有「光時」的貼紙或其他產品等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能觸犯《國安法》。涉違《國安法》者就算沒有定罪也會被扣押在拘留所，跟坐牢也相去無幾了。你看，47 名民主派初選的立法會候選人現在的下場？！還有，以前只是判罰款的案件，現在是重判坐牢。而記者收集資料報導真相亦是犯法。政權就是要在社會製造「寒蟬效應」。所以我們現在真的挺煩，每天生活在不能免於恐懼之中（苦笑）。

許多團體已經蒙受很大的壓力，像每年主辦「七一遊行」的民陣，及舉辦「六四燭光晚會」的支聯會，是香港兩大聯盟團隊，卻遭到紅媒文匯報、大公報不斷宣稱違犯《國安法》。這種稱為「放風」的手段把未經證實的消息放出來，雖然沒有警察真的去抓人，但也讓組成聯盟的團體擔憂且退出組織，而一般市民也受到《國安法》的威嚇而不敢公然支持爭取民主、平反六四的遊行集會等行動。政府可能是想不需要出手取締，便輕易地瓦解整個聯盟，打擊公民社會。

那你問我接下去怎麼辦呢？只能見一步走一步了。

平心而論，中國大陸的狀況還是比我們嚴峻許多，但公民社會還是沒有完全消亡……哈哈，不用那個表情，真的還有社會行動者在做事，不過風險就更大了。那香港還沒淪落如斯，雖然不可否認的是在往那個方向推……就看誰先死吧，我們現在就是「鬥長命」囉（笑）。現在我們期待的，就是人心不死，別輕言犧牲，留一口氣，點一盞燈，都是重要的。香港人守到民主戰勝歸來，便可以再次街頭相聚、煲底相見。

城 真的非常敬佩你們的樂觀和韌性。也向各位聽眾說明一下，「煲底」指的是金鐘立法會，因為建築外觀長得像電飯煲、也就是電子鍋而得名；「煲底見」是政爭者們約定抗爭成功後回到金鐘，脫下防毒用的面具和口罩，一同慶祝。不過香港現況簡直就是戰場了，還是再次表達我的敬意。

好的，接著談談本集主題連儂牆吧。家儀對連儂牆有很深入的研究，今天特別請她來分享連儂牆在香港的起始，以及如何以變化型態存續。其實節目雖然叫做存亡記，但我想連儂牆並沒有消亡，對吧？

劉 是的，現在香港還是有幾種不同變體的連儂牆。雖然，不見了當初遍佈公共空間色彩繽紛的便利貼，也看不到藝術感超高的文宣，但依然有呈現香港人的另類創意和民心不死的連儂牆。例如，在公車上、廁所間、電梯中、電燈柱及路邊欄杆等地方，也可以看到「流動連儂牆」。又或者，是在固定的連儂牆進行快閃行動，以及黃店的「無字連儂牆」，依然存在的。

城 在現在那麼艱難的時刻，香港人對連儂牆仍有一番堅持，是否連儂牆具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或象徵？是否和捷克的「Lennon Wall」有相似的意涵？

劉 先從名字來說，「連儂牆」(Lennon Wall) 這三個字是來自布拉克的一道牆。當年這道牆就是捷克人民以表達自由來對抗專制極權的象徵。後來，在 14 年雨傘運動時，香港金鐘佔領區靠近政府總部的一道牆上，由幾十張寫滿民主訴求的便利貼開始，在短短幾天之內，承載著自由心聲的便利貼卻淹沒整道牆。突然之間也不知是誰人，掛了一幅寫著「連儂牆香港」的橫幅上去。從此，它的名字與意義也確立了。

其實，之前香港也有這類發表民意的牆，叫做「民主牆」。在除了香港科技大學以外的所有大學或社會運動上都出現過。而在「雨傘運動」中，連儂牆出現之前，也有一位女生提供裁好的紙片讓大家書寫心聲，然後用膠帶貼上。不過，那時還是以民主牆來稱呼。直到我剛剛講的情況，這類表達民意的牆才正式轉名為「香港連儂牆」。而它與捷克「Lennon Wall」也一樣，除了民主自由的心聲外，主流社會禁止言說的意見都能在這道牆上暢所欲言。這兩道連儂牆都象徵著人民反極權、追求自由的意志。因此，它們把 80 年代的捷克、2014 年的雨傘與 2019 年的反送中等三場反抗極權的運動，跨歷史時空地連接起來。這就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抵抗的聲音。

▼ 繪圖：城鄉通訊編輯部

除此之外，在形式上，捷克的「Lennon Wall」比較多以塗鴉為表達手法，用油漆畫畫或寫歌詞來表達對自由的渴望。而「香港連儂牆」遍地開花後，不僅打破香港抗爭運動的傳統手法，即只集中某種形式和區域，讓各地區居民更容易接觸和參與到這場社會運動。尤其是剛開始的時候，使用門檻低的便利貼，人人都可以買到，人人都可以寫，就算沒有繪畫技巧或識字不多的人，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傳達出來，參與創建連儂牆，從而成為「反送中運動」的持份者。這種跨地區、跨階層的抗爭也代表著運動的「齊上齊落」。

同時，便利貼具備「Pinxel」、也就是像素點的特點，能製造出各種的效果，令連儂牆份外吸睛，藝術家和文化人亦紛紛以藝術介入社區，造就許多令人深思的好作品。而且，這些海量的七彩繽紛便利貼亦為連儂牆打出國際知名度，成為一種有特色又容易彰顯國際友好支持香港的象徵，甚至成為運動的共同語言。所以，它既能超越國家之間的地域邊界，也能打破民族間的語言差異，是「反送中運動」國際線有效發揮影響力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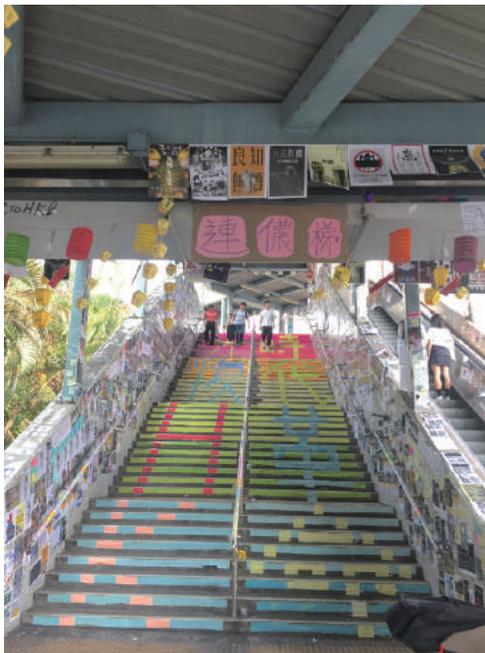
隨著運動的演變，連儂牆也有不同的變體。雖然時間久了或有新的消息時，舊的便利貼可能會被移除，這點和塗鴉的規矩是類似的。不過呢，香港有那種專門收錢拆牆的人，所以根本用不著煩惱貼滿了怎麼辦，自然有人來幫我們

騰出新的白牆（笑）。連儂牆從易撕易貼的便利貼逐漸轉變為打印的文宣，充滿情感的內容被各種資訊取代，而展品亦超越文字與圖畫，出現自製的模型或互動的遊戲。其後，輸出或拼貼的大型文宣品，以各種藝術手法打造精美圖像來表達社會運動的事件，更能深入人心。

我們先不管展現的手法是如何多元化，連儂牆有幾個重要意義：首先是門檻低、遍佈廣，可以讓許多深默的群眾直接或簡接參與，擴張了運動的層面。其次是凝聚和集氣，令同路人能互相扶持，使運動得以持續發展。再者是宣傳的在地戰能發揮鄉村包圍城市的效果，讓每天都很忙的基層民眾和通勤上班族，雖沒時間去看報紙，或沒有充裕的網路資源瀏覽社群軟體訊息，甚至是不會用手機和電腦的老人家，都能在連儂牆上，輕易閱讀及看到，流動速度極快或主流媒體不願意報導的資訊。

至於空間方面，連儂牆由剛開始的單面發展，到 3D 立體的全面覆蓋，形成場面壯觀的連儂隧道與連儂天橋。不過，在 2020 年《港版國安法》出台前，連儂牆在一夜之間消失於香港，但又在一天之間以「無字連儂牆」的姿態再現。今天，仍一息尚存卻又來無跡去無影的「流動連儂牆」，更象徵著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心不死。因此，簡單而言，連儂牆大致可分為感情舒發、資訊發放、藝術介入、全面 Be Water 等階段。





▲打小人互動裝置 / 卡通圖案拼貼 / 天水圍樓梯連儂牆
圖片來源：劉家儀

城 所以說最初連儂牆上的便利貼都是有寫字的，因為越來越緊張的形勢，最後終於變成無字的抗議。那麼抗爭者們是怎樣利用便利貼的像素特色，以及空白的便利貼來推展運動？

劉 一開始的連儂牆是大家隨意地貼嘛，但由於具有像素特徵的便利貼以海量形式湧現，令視覺上產生一種震撼感。後來我想應該是藝術家，把便利貼變成藝術的媒介，拼貼出巨大的人像。後續也激發了大眾的想像力，利用便利貼的像素原理，拼湊出運動中常見的卡通角色或重要口號，成為大家的打卡拍照景點。無意之中，也促進了連儂牆在網路上的知名度。不過這種圖像式的連儂牆也會被拆。當拆牆還沒那麼激烈化時，連儂牆其實是很有藝術價值的，只是後來就連貼張紙都得小心翼翼，就沒那麼多精力與時間好好地佈置了。

話說回來，公共空間的連儂牆備受打壓，而「黃店」還是持續貼著大大小小的便利貼和文宣——直到 2020 年 6 月 30 日。國安法通過前一天，許多「黃店」只能宣布將會拆除連儂牆，一夕之間，香港連儂牆消逝無蹤，不再以實體形式存在。

但還是沒死啦，正當大家心疼時，聰明的香港人又有新玩法。7 月 1 日遊行時，有位女生高舉白紙抗議，她說想看看荒謬的蘇聯笑話是否今日在香港成真，也帶給香港人很大的啟發。隔天，曾經是連儂牆的地方出現了無數白紙，而「黃店」也再度貼出空白的便利貼。直到今天，還是能看見商家牆面上的七彩便利貼，上面一個字都沒有，但大家都知道這代表著連儂牆、是支持手足的黃店，是像徵著反抗的意思。

城 那麼香港人是如何面對儂牆不斷被人破壞拆毀？最近從新聞報導知悉，有年輕人在連儂牆被人割破肚皮和頸部的案件，是否代表連儂牆有高度的危險性？

劉

連儂牆不停變體都是因為拆牆行動越演越烈。早期，為了減低牆民手足的受傷，以「撕一貼百」取代「死守」，而社區居民看到連儂牆被拆，也會自發性以迅速修復來抵擋拆牆的破壞力量。後來，牆民手足用更強力的膠水黏貼文宣作為反擊，令拆牆者沒那麼容易得逞，而撕除後留下的痕跡亦告訴大家：我們曾經來過。但隨著拆牆頻率越來越高，有人開始用更難清除的噴漆塗鴉。這些塗鴉不是那種很漂亮的，只是用噴漆罐快速地寫下訴求就跑，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增加清潔的難度，我還曾經看過有塗鴉上直接寫「媽的！我看你怎麼拆」！

所以，民間的拆牆傭兵只能塗上油漆覆蓋，但卻造成一種看不見卻又令人心領神會的痕跡。後來，政府部門使用噴槍水柱、甚至加貼牆紙去掩蓋連儂牆的紙痕與塗鴉，粉飾太平的工程便全面性展開。不過，民眾依然以上述我所講的「無字連儂牆」和「流動連儂牆」來延續抗爭的精神。

另外，由於 20 年疫情爆發後，政府進一步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例如發佈了 599G 限聚令，只要超過一定人數聚集於公共場所便會被驅散或抓捕。所以只要有人一起張貼連儂牆，便不用都上法庭審判就被罰款及強制解散。雖然手足很聰明，會約在大型商場進行抗爭活動，但警察依然會進入商場，隨便拉人湊數，馬上票控罰款，對整個運動的影響也很大，如昔日沙田新城市廣場的連儂柱也難以再現。而這個法令亦限縮了餐廳等商業空間的開放時間和人數上限，打擊經營，尤其是貼有連儂牆的「黃店」，經常成為被針對的對象。政府用疫情恐嚇民眾、借疫情立法來控制自由，此手段確實也很有效。

談到危險性…… 剛開始時，連儂牆的牆民手足沒有像示威行動的前線手足那樣，需要面對那麼多的直接暴力和危險，所以常被指連儂牆是「和理非」的活動。因為，想要留言的人不需要冒著在街上公開書寫的風險，可以在家裡寫好，拿過去貼上就跑，不擔心被警察抓到。就算被警察抓到，也難有什麼法條法規起訴，就算今天有手足被告，都只是以身上藏有什麼危險工具之名而判刑的，雖然只是帶著剪刀和噴漆。

不過，如我剛剛所說，有一些人是專門來拆牆的。這些拆牆的惡霸從一開始只是個人用拳頭毆打。後來以群眾形式出現，更手拿棍子來威嚇和攻擊他人，並同時進行有組織性的拆牆行動。由於在場警察面對護牆人與拆牆者對峙時，竟然是保護那些拿著武器的拆牆惡霸，並護送拆完牆的那些人搭乘計程車離去。表面上為了阻止鬥毆，實際上卻是在抓捕牆民手足，縱容持惡行兇的行為。最後導致拆牆惡霸肆無忌憚，拿刀、鋸子等攻擊性極強的武器，向牆民手足施襲行兇，令張貼連儂牆不僅有犯法的風險，甚至有受傷和致命的可能。

這些聽起來可怕，但對我們來說卻像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因為現在公共空間中連儂牆已經幾乎沒有了。不是滅絕，只是幾乎沒有，偶爾爆發重大事件時，還是會有人半夜偷貼，便利貼或文宣就再度出現在香港街頭，只是存在的時間當然不像以前那麼長了。



▲撕不掉的連儂牆 / 圖片來源：劉家儀

城 看來連儂牆真的非常有彈性，從寫滿想法到空白無字，從公共空間一路貼到廁所、公車，甚至以影像紀錄的方式達到一樣的效果，這些靈活的戰術性調整，讓它還能像游擊小隊一樣在高壓的都市叢林裡生存。那接下來我們談談具體的空間分佈，剛剛只比較大概地講到公共或私密空間，實際上哪些場所是連儂牆的熱點呢？連儂牆不停在形式上和空間上進行變體，對運動發展的影響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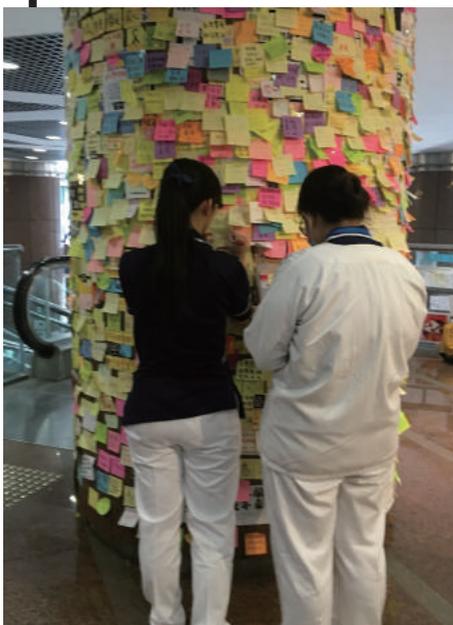
劉 對的，連儂牆是很有彈性，非常「Be Water」的。一開始，連儂牆只集中在政治權力核心區。但當民眾被驅離及民意被擋於牆外，連儂牆便散落各社區之中。公共場所便是連儂牆首選就是人流眾多的地方，所以幾乎在香港地鐵站旁都有出現過，尤其是地鐵站旁的地下道或天橋。香港真的很多天橋，因為高度都市化、人口密集，很多時候從地鐵出站就接到天橋，有時則是直通地下道，這些地方人流都非常多，所以首選就是這些場所。不過，地下道又會比更好一點，因為天橋要承受風吹雨打嘛，一直以來貼的都是紙類，天橋的話不用等到反對者來拆，下一場大雨可能就損毀了。不過有一些天橋上的連儂牆非常有意義或做得很好，牆民手足會用紙箱或塑膠板覆蓋，以作保護。

還有是一種半公共空間，比如學校、醫院、NGO 或議員辦事處。這些地方的資金來源屬於政府或公共捐助，其管理範圍則對公眾開放且具有自主性的。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最令人有驚喜的，是醫護人員自發創建於院內的連儂牆，除了同業表達意見外，也開放讓民眾來發表心聲。至於大學和支持民主的NOG 和議員的辦事處湧現連儂牆，不足為奇。但有些在政府產業內設立的議員辦事處，會被警告／勸阻張貼文宣，有些私人承租的地點則會被業主來「關心」一下。所有交通節點、學校、醫院及社區街頭，甚至生活中會到達的地方都看得到連儂牆，那時候真的覺得遍地開花。

再來，私人的話就是香港人所指的「黃店」為主，亦有其他私領域的部分，例如自家的汽車便是最早期的「流動連儂牆」。在私人空間出現的連儂牆是源於拆牆之故。記得比較早的時候，旺角某地下道的連儂牆很快被拆除，旁邊有家夾娃娃機店的老闆對此感到很憤怒，於是就把自己店面對外的玻璃窗捐出來（圖？），說這裡是私人領域、有監視器，誰敢來拆我就告他！這件事還有報導，雖然我不敢確定是不是第一例，但確實

從這件事開始，越來越多的「黃店」願意讓人張貼連儂牆。隨著拆牆行動加劇，有人以噴漆的形式製作「撕不走連儂牆」；也有人把個人身體化作為一道牆，讓民意便利貼直接貼上，形成「連儂人」；甚至有人用馬賽克磚貼連儂牆，總之就是還擊拆牆惡行，強調「撕不走」的意義。

◀▼伊利沙伯醫院連儂柱 / 葵芳連儂隧道的馬賽克磚圖案
圖片來源：劉家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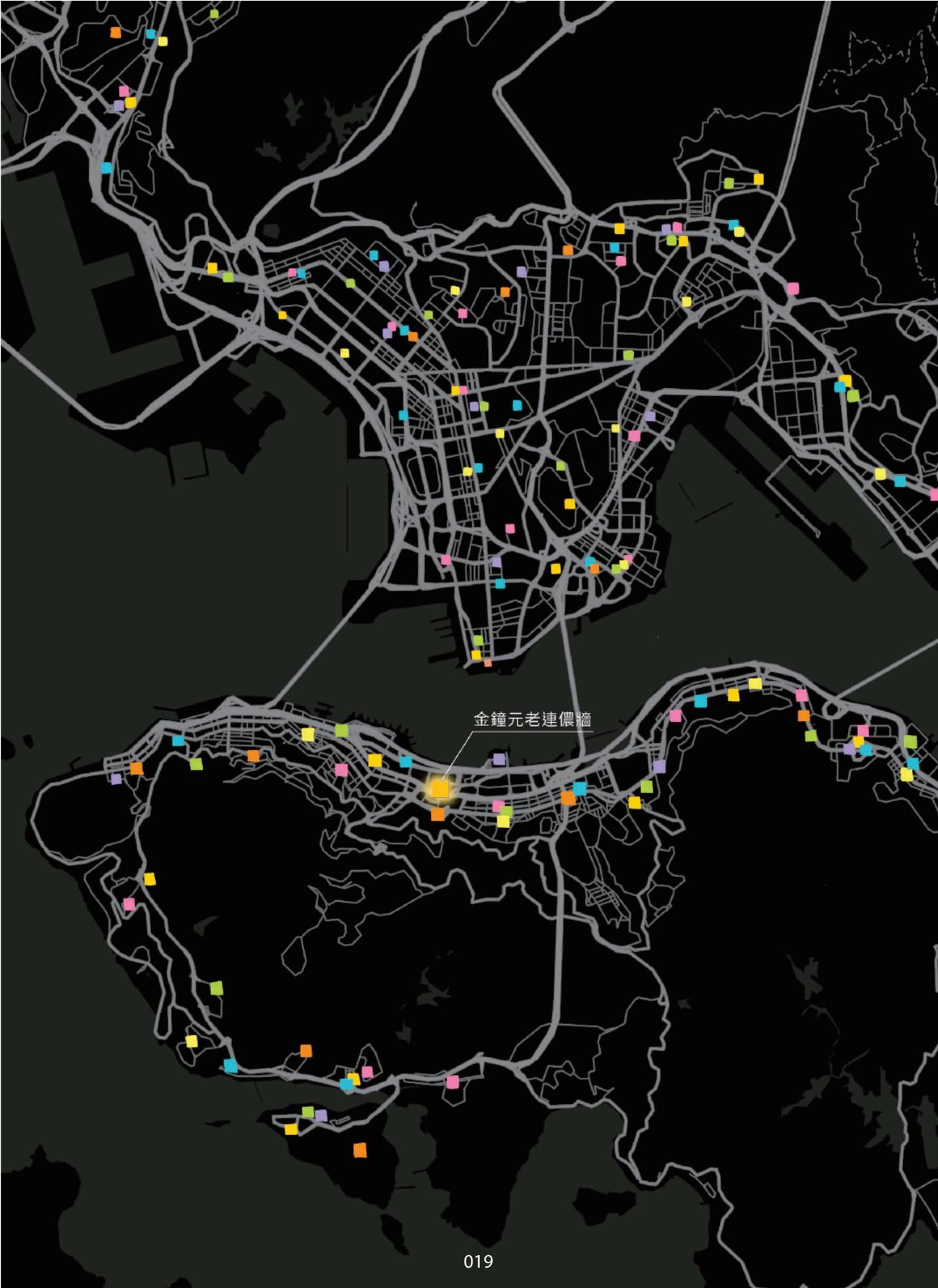


隨著情勢演變，拆牆和打壓越來越嚴厲，警方、黑道和藍絲的暴力越演越烈，公共場所貼連儂牆的風險增高，民眾也就不敢再把自己毫無準備的暴露在危機中。「撕一貼百」的策略亦逐漸被快閃、流動等形式取而代之。當《港版國安法》通過，連儂牆再次進行變體。先是內容轉變的創意，即把運動的口號／標語變成符號，用簡單的幾何形狀或類甲骨文形體來代替文字，成為抗爭的公開暗號。懂的人便能心領神會，暗爽一番，而政權亦無法以國安法之名進行逮捕。另一種是「流動連儂牆」，不再限於社區、店面或公共場所的固定牆面，任何空間包括電梯、公廁、公車椅背等不正式的空間皆是承載體。我曾看過公車椅背被貼得滿滿的，當然在公車上貼便利貼風險還是非常高，雖然不像在公共空間被發現就有被抓、被打的危險，但貼的時候要迅速而富有技巧，也得要有背負風險的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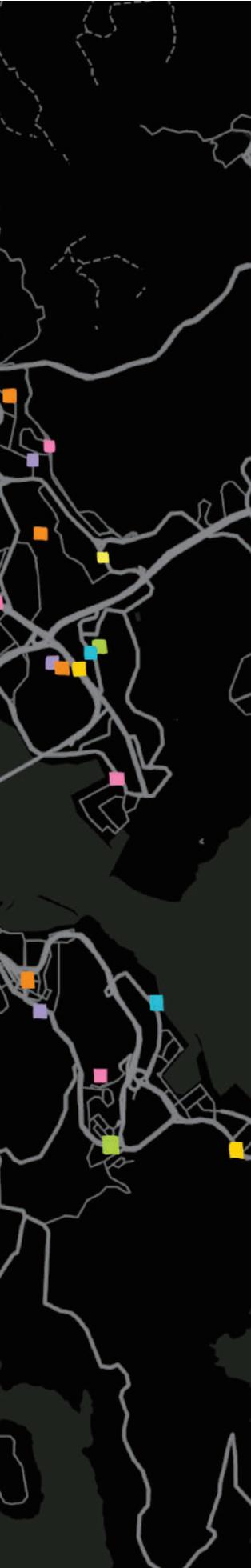
現在大家就看哪裡能貼，就去貼一下，會尋求更隱蔽的地點與方法。例如在公共空間有快閃的連儂牆與塗鴉，內容可能會是符號化的抗爭口號，或與時事相關的訊息。但人們皆認為只要是自由表達反抗極權聲音，那就是連儂牆。總之，連儂牆隨著政府持續增壓的打壓與迫害而改變，不斷變體，直到今天仍在變化中生存。就算有一天我們真在再也看不到任何實體連儂牆，它還是存續在香港人心中，不會消失。

而且就算現在連儂牆能存在實體空間的時間更短了，但網絡空間的流傳則更多更廣。不管是張貼的人或路過看到的人都會拍照上傳，這些紀錄在網路上不斷流傳。不要小看這種方式啊，要說是同溫層取暖當然也行，但我覺得這更是「人心不死」的象徵。極權國家的手段，就是孤立人們，當人覺得自己孤身一人的時候就不敢講話、不敢做任何事，但當把訊息傳遞出去，就會發現自己並不孤獨，也會發現社會上還是有人願意冒險犯難對抗極權體制。拍照流傳並讓更多人看到，這也是社會運動的效果。

沒錯，這些靈活的戰術性調整，可以笑說是「小強（甲由）」的「打不死精神」，目的就是讓運動精神延續下去，同時也證明香港人不死心。今天的連儂牆已達到一個「無形、無式、無時間、無地點」的境界，確實彰現出運動的「Be Water」象徵。而且，連儂牆是「反送中運動」的一部分，儘管街頭大型抗爭暫時停止，但反極權、爭自由的聲音依然在不同變體的連儂牆上迴蕩，讓運動繼續延伸下去，直至煲底相見。



金鐘元老連儂牆



城 現在香港的情況真的……或許對我這樣的台灣人來說是無法想像的慘烈。就我了解，言論自由受到強烈的打壓，像連儂牆的內容從文字轉變為符號甚至空白，就是再明顯不過的案例，相關的記錄也是談都不能談，電影《理大圍城》上映前突然喊卡，也都不需要什麼合理的解釋。還有教育現場也變得宛如文革再現，鼓勵學生告發老師與多不勝數的審查，去年底就有香港考試局的工作人員因為出了一道申論日本侵華利弊的題目而「辭職」。公民團體也難以生存，需要警察局的許可才能活動，其中受到的刁難可想而知，有的甚至連銀行帳戶也被凍結，不能收受捐款，就像是被輾斷了手腳，無法再有任何行動。因此從反修例運動開始的一波香港移民潮，都不能稱之為移民了，畢竟應該是嚮往更好的生活而轉換國籍才是一般理解的移民吧；我想流亡可能會是一個比較貼近現實的描述，而政治人物或原本那些意見領袖，幾乎就是逃亡了，畢竟再不離開就只能等著被抓，顧及家人、小孩，這也是無可奈何之舉。

不過在這樣黑暗的時期，還是有很多台灣的老同學朋友關心香港，一直以來都以各式各樣的行動支持著，只是現在香港的消息越來越難流出，而有的情況我們知道了好像也不知該怎麼協助。面對這些困境，香港人現在的對策是什麼？以及也想請家儀給關心香港的人一些建議，在這種時期，做些什麼會對香港有幫助呢？

劉 我覺得目前還沒到最黑暗的時期啦，未來一定會更黑暗的。那香港人現在就是「鬥長命」，看誰撐得久囉，還有我們也常常寫「見字飲水」，看到我這個留言就去喝水吧，意思是希望大家保持身體健康、好好活著，跟鬥長命是同樣的意思。

最近太多人被抓去坐牢，所以就會說「裡面夠人、外面要人」，要大家不要那麼輕易被抓，留一口氣，繼續點燈，真正的抗爭戰場在監獄外面。現在的對應方法就是這樣，有些人還覺得我們挺樂觀的，說實話，不樂觀還能怎樣？香港人已經沒有悲觀的權利了。我們只見到方向，就是「煲底相見」的方向，但用什麼方法走去，就要看香港人的智慧了。可能在這段越來越黑暗的日子，要嘗試不同的方法，儘管行動是被困禁，但靈魂必須是自由的、初心也是要堅持的。總之，不要習慣政權各種「荒謬」的手段，在自己的崗位上堅守專業的精神，每個崗位都能守住一點，起碼要做到不讓香港快速被消失。

另外，國際線也非常重要，國際輿論是否還專注香港會有很大的影響，先前 47 個候選人被抓時歐美領事館都有到場，開庭也會派代表去旁聽。不過《港版國安法》之下，未來判決過程可能就不讓人列席，像中國大陸那樣，所以才說現在還不是最黑暗的時候啊。

劉

台灣的朋友們，畢竟遊行集會也不是常常發生，回歸到日常的個人層面，我還是建議大家幫忙多寫一些文章、多關注香港一點。其實不需要很嚴謹或很學術的論文，可以寫不同的文章去投稿，因為對方有很多打手，會用假消息或假報導來混淆視聽、虛構事實。如果我們寫得不夠多，就會被定調，最後一搜尋，結果都是「香港有暴動」、「香港暴民」之類，那就真的完蛋。我認為不管是個人觀察或感受，或者曾經來過香港的體會，無論感性分享或理性分析，都可以盡量寫。

此外，雖然香港人也是華人，但還是跟中國大陸非常不一樣的。經歷百年殖民而發展出的特殊生活樣貌，而這種文化正如新疆那樣瀕臨滅族危機，大量的移民要把香港換血，三十年後這裡恐怕就會只是另一個中國城市。要扭轉這種局面，延續香港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策略。我們可以從不同層面去談，比如和中國的差異如何形成，或者單純的書寫香港飲食文化，像西多士、香港奶茶、茶餐廳都是從殖民時期轉化而來的。說到這個，我可以預言台灣朋友未來有口福了，因為許多香港人跑過去，現在台灣的茶餐廳或燒臘店品質對我們來說實在是一般……總之未來一定會變更好吃的（笑）。

所以台灣朋友除了多吃一點香港的好東西外，也請多談一些香港文化。或者可以多唱粵語歌、看看香港雜誌，甚至是在臉書 po 張以前來過香港的照片，最少也可以轉發別人所寫的香港文章。別小看這些小動作，對香港裡面的人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持，別讓極權孤立了香港人。我們一定要透過自發性的民眾行為把發言權奪回手中，才能對抗制度性的維穩策略，曾經發生過的事、存在過的人才不會被抹消。希望台灣和國際友好都能持續地相挺吧。

城

我們打遊戲的時候常常說「逆風不送」，跟家儀剛剛講的大概是同一個意思，就算現在是逆風局，大家也不要氣餒，更不要送頭，徒增對手的優勢。只要堅守下去，保存力量，一定能等到翻盤的一天。這邊也呼籲聽眾朋友關注香港的各個面向，不要低估每日細水長流的關懷不管是寫文章、po 照片，或去吃港人經營的飲茶，或找時間和香港朋友聊聊，都是很有幫助的。大家對香港有什麼美好的記憶呢？歡迎到我們城鄉 On Air 粉專上本期節目的留言區回覆分享。

今天感謝家儀的連線，帶來有關連儂牆的許多故事，也從連儂牆的演化過程中帶我們看見香港反修例運動以及香港整體局勢的經歷。那本期節目就到這邊，謝謝各位的收聽，讓我們一起關注香港，期待下期城鄉 On Air 再次空中相會。





放送！放送！

予全臺灣聽著阮的心聲

放送！放送！

予全世界會記著阮的名

放送！放送！

予正義佻和平趕緊來到遮

這個理想一定愛你知影……

坐著自強號

我來到這個繁華的所在

吵鬧的大都市

打拚的子弟

無論跔佇啥物所在

我攏別袂記

別袂記少年人的志氣

放送！放送！

予全臺灣聽著阮的心聲

放送！放送！

予全世界會記著阮的名

放送！放送！

予正義佻和平趕緊來到遮

這個理想一定愛你知影……

雜誌看香港

香港雜誌類出版品推薦

聽完本期城鄉 On Air 的節目之後，想更加了解香港，卻不知從何下手嗎？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要找到影音資料固然不難，但何妨試試回歸紙本媒體，感受油墨印刷的觸感與排版視覺之美呢？本期香港專欄同場加映，編輯部推薦五本香港雜誌，期待各位也能從閱讀中感受香港書寫特有的風情。

圖 / 文來源

樣本 | samplemagh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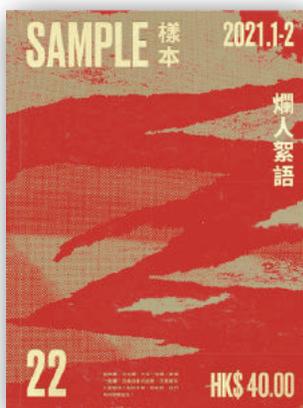
Breakazine | www.breakazine.com

東西譚 | paroles.hk

號外 | www.cityhowwhy.com.hk

字花 | zihua.org.hk

虛詞 | p-articles.com



SAMPLE

文藝
流行文化

香港文藝評論雜誌，雙月刊，每期聚焦一文化主題，以編輯專題及文稿眾論深入探析，在高速的時代重提細緻閱讀及深度評論。取名樣本 (Sample)，意為採樣、取樣，透過文化解讀以一見百，亦在主題、編輯、出版上力求實驗。



Breakazine

社會議題
時事

在深度探討的背後，是打破社會常態、創造可能的匠心。折角的符號，提醒我們不甘於常態，利用 90 天的慢媒空間，求問根本，打造實驗求真的香港社會專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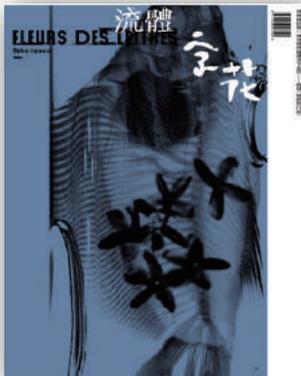


東西譚

文化

藝術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出版的期刊於 1988 年以《東西譚》之名問世，其前身《Le Journal de Hong Kong》創刊於 1971 年，時至今日已被忠實讀者視作參考的讀物。《東西譚》基本上以法 / 中雙語出版，內容除了探討所有能使香港人感興趣的法國文化外，亦成為法國人認識香港和中國文化的橋樑。



字花

文學

《字花》創刊於 2006 年 4 月，由水煮魚文化製作有限公司出版。創刊之初，以「立足本地，放眼世界」為旨，力圖打破香港文學雜誌的固有形式，以展示文學年輕、活潑和多元化的一面。



號外

文化

潮流

《號外》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月刊，自 1976 年創刊 40 年來都走在最前，以先鋒文化啟迪創意生活，記錄世道人心，反映時代的渴望與期待。



▲ 左：尖沙咀彌敦道上港鐵站 /
右：黃大仙區龍翔道石壘上標語
圖片來源：劉家儀

疑幻疑真的 Google 連儂牆

文字 劉家儀

眾所周知，街頭抗爭和連儂牆行動都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缺一不可的部分。同時，這也是一場改變香港社會運動形態的城市空間爭奪戰，把社會各界別／階層人士牽扯進去，在不同區域、以不同方法參與了運動。作為社會運動一份子的筆者，走進「18+1」¹的空間，以積極性參與式觀察及收集田野資料，探究連儂牆的分佈和形態，並從過萬張相片的內容分析藝術進入社區、香港文化重塑、群眾心靈連繫及照護與情感地景，並與牆民手足進行深度交流，了解連儂牆發展過程如何與民眾互動，思索這個再現空間怎樣形塑新社群身份。

然而，連儂牆內容與意義實在太豐富了。本文章僅能集中分享筆者對其中一個網絡空間——Google 的街景視圖——尋找到的有趣現象。在網絡發達時代，「反送中運動」有許多行動借助 Google 地圖，而當筆者利用 Google 地圖製作連儂牆地圖時，發現 Google 街景地圖上，金鐘夏慤道、九龍從太子到尖沙咀的彌敦道和黃大仙區龍翔道可尋回「反送中運動」的街道標語，讓人有穿越時光隧道之感。雖然，根據去年9月中的報導，標語已經被模糊掉了。最近地圖更新之後，許多街道視圖更是再找不到清楚／模糊的標語了。但筆者卻發現某些地區消失的連儂牆之真實場景依然存在於網絡街視圖之中。

1 「18+1」空間是指連儂牆分佈於香港十八個行政區的實體公共空間及一個網絡空間。

2 香港福建幫指來自中國閩南民系組成的社團幫派。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在北角一帶發生多次暴力事件，抗爭者經常被福建幫人士毆打或互相打鬥的情況。

首先，以香港炮台山連儂牆為例，它位處香港島區的東面，港鐵站出口旁邊，與福建幫²的北角為鄰，但社區內中產屋苑、私人樓宇及多間酒店林立，人流甚多，連儂牆雖小但生命力很強。雖然，今天這個固定的連儂牆已被政權清洗得乾乾淨淨，粉飾太平的工程亦已竣工，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從 Google 地圖上，往中環（西）方向一邊的英皇道則可見這一帶看似全新的水泥牆。但神奇的是，當 Google 地圖的箭頭移至另一方向，即在英皇道往筲箕灣（東）方向的一邊，地圖則清晰地呈現整片的昔日連儂牆。這種效果彷彿令人有一份疑幻疑真的感覺。

同樣的，在港島區的古太城連儂牆也一樣，在英皇道往中環方向的一邊是最新的影像，但在相反方向便可以看到各類文宣張貼於牆上。當筆者把尋找的目標移至九龍區深水埗富昌邨和長沙灣元洲邨，情況稍有不同，即在兩邊的行車方向皆能看到昔日連儂牆的蹤影，甚至可清楚見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共匪走狗」及「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等文宣，但只要箭頭靠近牆身便是一片空白，呈現「乾淨」的街景，似乎一切回歸「正常」。



▲ 上：2019年10月21日炮台山連儂牆 /
右：從往中環方向（往西行）的英皇道看炮台山連儂牆 /
下：從往筲箕灣方向（往東行）的英皇道看炮台山連儂牆
圖片來源：劉家儀 / Google Map

▼ 在Google地圖上長沙灣元洲邨連儂牆的對比
圖片來源：Google Map



然而，最令筆者感到興奮的，是位處於半公共空間的香港島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的連儂天橋。原本筆者以為 Google 的拍攝不會進去醫院的範圍之內，但在無意之中移動箭頭時，卻發現從某一角度觀看，昔日連儂橋的圖像和「反送中」、「SAVE HK」、「粉紅連豬」等文宣皆能清楚看見。而街道的另一頭，也顯示出牆身另一面的樣貌及「連儂牆」三個大字。可是，箭頭進一步靠近連儂橋時，視圖又變回現實中一條平平無奇的天橋了。

從上述 Google 地圖的例子來看，這邊廂是政權／管理層以權力控制公共空間，用牆紙、油漆、清潔劑來掩蓋牆身留下的民意，維持繁榮安定社會空間的意識形態表象。那邊廂，未經編碼的符號、集體性作品所形塑的連儂牆「再現空間」卻又顯身了。昔日民間集體「發夢」³的蹤影彷彿仍然真實地存在，令人產生情感共鳴。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的「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並存於 Google 地圖，共編了這疑幻疑真空間感，打破了時空的框框，令瀏覽的時間被切片，在同一網絡地圖上穿越平行時空，為連儂牆再增添多一份「異質空間」⁴的感覺。



同時，柯司特 (Castells, 1994) 所指的都市使用者不斷地重新改變都市的意義，而都市意義的改變具體呈現在空間的文本符號的改變⁵。「18+1」空間的連儂牆就是最佳的例子。民眾透過不同的符號把連儂牆建構起來，是個複合的地理符號，既有抗爭意涵，亦是民眾情感地景，甚至成為紀念性地標，使這場社會運動享負國際之盛名。

Google 街景視圖與 18 區的連儂牆一樣，擁有揭露或映襯真實空間的虛幻、髒污或不完美的力量，使人們所處的地方更真實也更不真實，是面對真實不民主社會的一種補償。連儂牆消失後，民眾似乎無渠道可表達、無地方可抒發、無處可立錐。現今的香港社會處於「荒謬常態」，在網上找到這些再現的異質空間讓抗爭者可在懷緬中，獲得一絲絲快感，間接獲取一點喘息和打氣的機會。

雖然，現在大部分實體版的連儂牆都被清除了，Google 地圖再現的視圖，也會在不久的將來被消失。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抗爭者在這場「18+1」公共空間爭奪戰中，確實曾贏得短暫的勝利。而這種短暫奪回空間話語權、建構「異質空間」的說法可能被指為精神勝利，但「異質空間」讓參與者透過連儂牆實踐由下而上的空間治理，並啟發出民眾在公民抵抗過程中，以不同的創意來突破施加於人民身上的種種枷鎖，讓社會運動不會變成一潭死水，且成為雞蛋對抗高牆的「上善若水」策略。

在這種疑幻疑真之下，最後以一句形容香港宿命的經典句子來作結：「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2019 年香港連儂牆也借了公共空間大半年時間，今天再次借用了 Google 地圖的網絡空間，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消失，也不能預知何時又一次再現，但歷史總是充滿了偶然和諷刺的。



▼在Google地圖上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連儂橋的對比
圖片來源：Google 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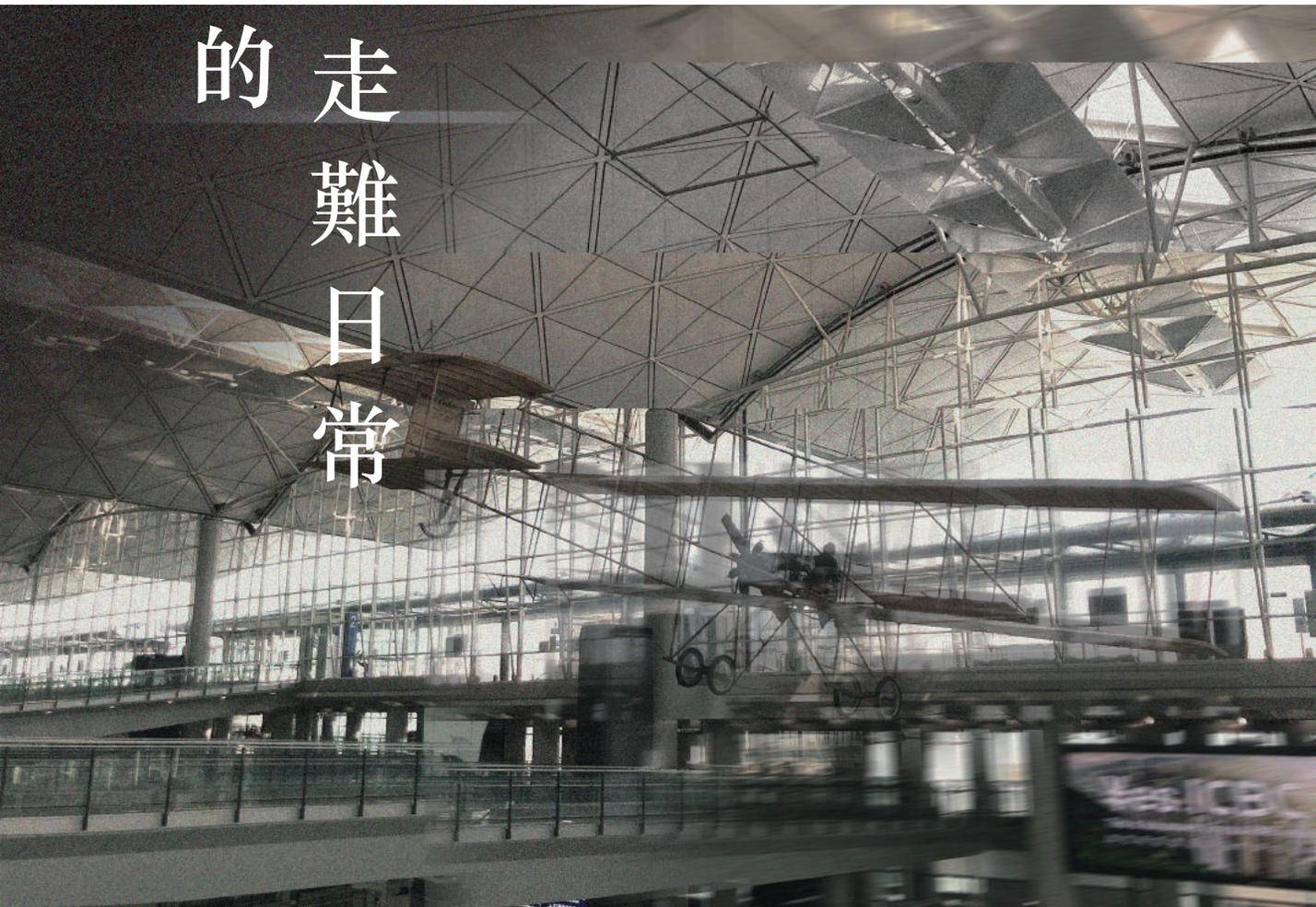
³「發夢」是抗爭者對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所製造的術語／暗語，意思是參與抗爭活動（尤其是可能涉及到違法行為）。

⁴傅柯的 heterotopia 概念在中文翻譯為「異質空間」，但可能未能表達 heterotopia 的全部意義。因此，當使用「異質空間」概念時，應把傅柯對於規訓的概念也一併考慮進去，即「異質空間是指一種能擺脫規訓社會賴以形成的特定空間，是呼籲人們與其再醉心於改變歷史，倒不如致力於締造異質空間，擺脫規訓社會的重重制約。」參考馬國明（2014），〈兩傘運動產生的異質空〉，香港，《明報》，2014 年 11 月 23 日。

⁵Castells, Manuel (1994) 〈一個跨文化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陳志梧譯），收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2002 年 12 月增訂再版，第 223-300 頁。

香港人的

走難日常



文字 流人

隨著連儂牆上的文字和圖案暫時消失於公共空間外，香港人的存款也逐漸消失於銀行，朋友／戰友亦日漸離開生活圈，有的在坐牢，有的移民／逃難／流亡。先不談因為政治因素而坐牢／流亡的港人，香港人逃難／移民的心路歷程和出走路線便讓人心酸，有人一夜決定，有人月內起行，有人等待的是寵物的機位，更有人計劃「先離婚，再重聚」。到底香港變成了一個多荒謬的世界？！

朋友 A 是一位英文不到初中程度的年輕爸爸。某天，他回父母家尋找「BNO」（英國海外公民護照），卻遍尋不果。當時，他並沒有任何移民的計劃，只是覺得「一照在手，以防萬一」。事實是，他的父母卻擔心他帶著孫子遠走高飛，堅決否認他申請過 BNO。為此，朋友 A 決定致函英國護照處查詢紀錄，回覆確認他曾經擁有過 BNO，故可以申請補領。說時遲，那時快，香港的情勢也有大變化，這位年輕爸爸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取回 BNO、退租房子、變賣家當，離開香港。我問他：是什麼原因觸發你下定決心且走得那麼快？他說：「我無法忍受自己女兒將來說一句話就要坐牢。」其實，現在他懷中的女兒連一句完整句子都還不會說呢！到底香港社會是變得多恐怖呢？！

朋友 B 是一位帶著兩個小朋友的中年媽媽，他們夫婦二人都是高學歷的中產人士。近來，她不時跟閨蜜討論如何／何時離開香港，方知大部分女性都困惱於早期 BNO 居留「5+1」方案的入藉年期計算方法，即持 BNO 的父母需要與子女一同移民英國。而她們為免老公工作擔誤了子女入藉的時間，影響他們上學的公民權利。因此，曾經想過先離婚，老公留在香港，自己攜帶孩子移民，日後再一家團聚。她笑言：「傳說中，要仔女唔要佬啦，哈哈！邊個唔想一家大細齊齊整整、安安全全咁走去英國，呢個決定都無奈……但真係驚走唔切囉。」（書面語：「傳說中，要孩子不要爸爸，哈哈！誰不想全家人一齊安全地去英國，這個決定都很無奈……但真的很害怕來不及走。」）

雖然，最近英國政府已經放寬方案，父母其中一人可先到英國，免除了許多香港人的煩惱。然而，當法庭判處香港「和理非」代表人物（大狀、律師、前立法會議員等人）參與不獲批准的遊行示威的罪名成立，並重判入獄坐牢，這位朋友也即將在一個月內離開香港。

至於其他 C、D、E……朋友也沒有久等，因為擔心《2020 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於今年 8 月 1 日生效，政府有權禁止某人離港，甚至有傳言指政府可能會全面封關，從此禁止香港人自由出入境。這種恐懼不斷發散，籠罩住整個香港，令不少家庭憂心耿耿。有人連夜改機票提前離開，行裝也靠親友寄去；有人不管疫情，請假到英國買了房子，便馬上返港辭職，攜家帶眷匆忙跑路；有人更怕政權監管或「金手指」報料，靜悄悄地飛往他鄉才致電上司，永不回來了，甚至有人與伴侶天天吵架，8 月前不走便要妻離子散。此刻，不禁一問：到底是怎麼樣的恐懼才會令香港人如此落慌而逃，不辭而別，揮袖而去？！

這種逼不得已，慌忙離開自己成長的地方／喜歡的土地，對今天的香港人來講，這不是移民，而是逃難。為的是保住下一代的生命和自由，求的是可以在安全環境下看到香港民主的一天。不過，還有一群原本計劃移居／旅遊他鄉的人們，擱下計劃，留守香港，堅持的，是永不放棄的理念。

今天，有人為保一口氣而離開，也有人為點一盞燈而留下。留一口氣的人只要有做事，也是在遠方為香港點亮一盞燈。仍在爭取自由征途上的點燈者，亦要留一口氣走下去，履行齊上齊落、煲底相見的一份承諾。無論香港人選擇了走哪一條路，在海外寫信和宣傳，還是留港買「魷魚絲」與「M&M」（獄中人所需品），所有看似微不足道的堅持，都是一起撐到底的陪伴。



林傳芄學姊訪談： 香港農業話你知

採訪 葉庭瑜

▲香港荔枝窩農地，照片提供：劉家儀

香港有農業嗎？或許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讀者會和編輯第一次得知香港有農地時一樣驚訝。各種媒體上再現的香港總是那樣，維多利亞港、尖沙咀、旺角……多不勝數的繁華圖像，可能讓人聯想到金融、地產、流行文化，卻看不到匆匆步伐下踩踏的是能夠生產作物的土地，語速匆忙的人們可能提著剛剛買來的在地農作物。本期校友涸流，邀請到 R05 級的林傳芄學姊，帶來香港農村與土地的視野，與我們分享香港農業發展現況與疫情下的影響。

在香港城尋求農業？不、你並沒有搞錯什麼

第一步，讓我們先把視野從港島與九龍地區 zoom out 出來。

以地圖視角俯視香港全區，除了左側的大嶼山之外，濱海平地與深圳之間還有大片大片深淺不一的綠色，那裡是新界，有著山野、丘陵與星星點點的農村聚落。傳芄說明香港農業歷史，在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之前，在此定居的人民稱為「原居民」，他們多種植水稻，在新界擁有土地或住宅，同時也掌握較大的權力。然而到了上個世紀 40 年代至 60 年代之間，因戰爭以及文革等因素，從中國大陸逃難到香港的人口大量增加，民生用水需求量隨之成長，加以港英政

府鼓勵原居民移民海外或搬進城市成為廉價勞動力，這些水稻田便慢慢空出。而這個時期中遷移至香港的人群中有不少是原本種植蔬菜的農民，將技術帶入新界，水稻田便成了用水需求較低的菜園。因此在 90 年代以前，新界仍是香港蔬果供應的大宗來源，直到回歸後難以和中國大陸輸入的低價蔬菜競爭，農業人口逐漸流失。

如今，香港的本地農業主要包括蔬菜種植和養殖業（豬、雞、魚產），常規生產為主，有機生產的比例雖然有所增加但仍只佔少數。有機農業的主要產品是蔬菜，也有少量的水果，

近十年則有一些年青農夫嘗試復育稻米種植，不過產量不多，通常結合教育和休閒元素推動。二十多年前，有機農業在環境保育和健康食品的召喚下在香港開始生根，在環保團體和有機農業先驅的長年堅持下，克服種種困難，又得到關注環保和／或健康的顧客和團體支持，在中國大陸供應的廉價有機蔬菜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高價有機產品的夾縫中生存下來。

香港社會對農業的關注與詮釋，也隨著時代不同而變化，從 90 年代起興起的食物健康意識，在 2008 年爆發的一系列反高鐵、反迫遷運動中開始了轉變。反對因興建高鐵而訴求「不拆不遷」的「菜園村事件」將香港本土農業從土地規劃的爭議延伸，連結上城市發展方向的思索，使農業和農業土地得以在社會討論中得以佔一席位。雖然最後高鐵仍落成，農民遷往新村重建家園，但這件事促使部分行動者投入香港本土農業，為其發展注入新動力並年青化。帶著新思維的年青從業者似乎是理所當地採用有機方式生產，並且更大力地投入教育和產業多元化。

正是從菜園村開始，社會運動似乎與農業產生了聯繫。在 2014 年的佔領中環運動中，有些來自新界的人們在現場鋪上土壤、種植

作物，讓看似日常的農業議題在政治抗爭中現身，農業的意義從食品健康、環境保護，漸漸地和香港的身份認同、本土意識劃上等號。香港農業的存續、食品自給率高或低，這些問題背後，事實上扣連著更大的關切——城市的發展何去何從？又是以什麼角度談發展？若以大中華本位主義來看，上述問題可能根本不是問題；但若站在香港本位視角，答案則完全不一樣。香港農業關乎著人們每日的消費與飲食，如此平凡而日常，卻又隱含著政治的訴求與想像。



▲▼雨傘運動中排列出雨傘形狀的農作物，照片提供：劉家儀



菜籃裡裝什麼：新冠肺炎與之後

持續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為全球帶來了新常態，許多日常生活的習慣都發生了改變。在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也為本地農業帶來了新機遇。

2020 年春節假期過後，疫情開始惡化，香港政府宣佈部分公務員實施居家工作，私人公司和非政府組織也陸續效仿。此後，隨著疫情的反覆好轉和惡化，在疫情嚴重時，便實施不同程度的居家工作。此外，在政府的防疫措施下，餐廳間中停止在晚餐時間營業，經常在晚餐時段外食的香港人被逼留在家中自己煮食。疫情使許多社交活動暫停，在家煮食是生理需要，也是社交活動的替代品，上網路搜尋食譜，到市場採購食材，在社交網路上貼上自煮菜式的照片，安排每天三餐成為大家的主要日常活動。香港的農產品也「得益」於這種新常態。

當疫情爆發後，短暫供應不足的物流讓香港人開始重新討論食物自給，當大家必須在家煮飯食，會認為香港本地生產的蔬果更信得過，而買有機蔬菜雖然比大規模生產的蔬菜更貴一點，卻比外食便宜，這使香港有機蔬菜的銷售進入新的地景。本地有機農夫開始透過到府送貨、蔬菜包、快遞等等方式，開發新的銷售渠道，傳芃也分享她相熟的農夫便是每週帶著農產品，沿著地鐵站和固定的賣家「面交」。不論是農夫自己送貨，或者在網路上販售，都需要居家工作的模式支持，試想正常上班時不太可能暫時離開公司去地點站拿菜，若在家裡卻能夠彈性安排自己的時間。固然新冠來言帶來病痛、不便與死亡，在這樣嚴酷的時代，對香港農業而言卻還是有正向的轉機。

然而香港本土農業會就這樣開始獲得更多的關注與資源嗎？這個問題，或許得從 2016 年香港政府頒布的新農業政策找答案。這個以號稱參考新加坡農業、為了增加香港農產量的政策，決議收購位大量私人土地，建立佔地 80 公頃的現代化農業園，而選址則在新界上水鄉的蕉徑——這裡正是 7.80 年代

香港的蔬菜生產中心，有許多的非原居民在此租地耕種。打著振興農業旗幟的政策，事實上犧牲了這些沒有持有地產、住屋也是臨時牌照的農民的權利。傳芃向我們轉述，農民們非常反對此政策，因為首先為了現代化建設而必須開拓一條馬路，許多農地就此消失。次之，政府完全不懂農民所需為何，意圖建造農夫宿舍，強制改變原有因應耕種需求而產生的居住習慣，比如在採收季節需要城裡的兒女回家幫忙，卻無房可住；需要在夜裡巡視農田，遠離耕地的集中宿舍只是無端造成困擾。此外，建地更是選在低窪地上水文匯集之處，農民認為只要雨季必然淹水，也難以維修，足見上位者完全只以地圖當作規劃參考，絲毫沒有考量真正的需求。

在香港東北的粉嶺一帶，因為是難得的平坦地區，一直以來都是資本勢力覬覦的土地資源，地產商派出港人稱為「艇仔」的揸客出面購地，大量囤積等待政府的開發政策，一夜致富。而現在這些當初沒有出售土地、維持耕作的農民們，則面臨制度性的強制徵收——最荒謬的是，以振興農業為名的政策，剷平原有的農村聚落與種植用地，正是破壞農業的元兇。

新冠肺炎帶來的消費與飲食習慣改變，讓我們看見香港農業、特別是有機農業的可能。承接著 2014 年以來興起的本土意識，本地種植的有機蔬菜不再只是單純的健康纖維質，也參與到香港本位身份認同的議題中。然而虛應故事的農業政策為了建設而建設，推土機無情地將農園夷為平地，無疑對農民造成巨大的傷害。當然香港還是有許多社區支持的農業，仍能夠在艱困的環境中存續，實踐本土友善耕種，像是傳芃論文中田野調查的馬寶寶農場，除了種植蔬果之外，也定期舉辦農作教育課堂，讓香港城市與鄉村能互相支持。期待有一天疫情消泯，我們再次踏上香港時，能夠走訪這些農場，嚐一嚐這片土地養育出來的蔬果，讓舌尖記住新的香港滋味。



▲馬屎埔村的抗議地產商收購農地的布條，照片提供：林傳芃

4.09

（五）19:00-21:00
工學院綜合大樓313室

修復的訊息： 莫拉克災後重建村的 原民塗鴉實踐

建築與城鄉所博士生

胡哲豪 Valagas Gadeljeman

原住民的莫拉克災後重建研究著重家屋前庭及公共空間之文化營造，鮮少關注作為居民表述媒介的社區牆面彩繪。莫拉克災後重建的永久屋牆面上多有塗鴉與彩繪，經常吸引觀光客注視，然而，這些文字與圖案對災民的意義又是如何呢？通過牆面彩繪，排灣族人如何建構對陌生環境的新認同，進而修復永久屋建築中關漏的文化面向？

本次演講，講者將分享族人通過牆面塗鴉，修復斷裂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的過程，從而剷除外界長期以來關於災民的污名化想像。值得注意的是，建築空間內蘊的社會與文化能量為這些藝術行動提供了修復基底，令居住於永久屋的原民行動者能通過壁畫傳達佚失中的古老歷史，在重建村建構集體認同。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NTU BP

▲圖片及簡介來源：城鄉所官方網站 <http://www.bp.ntu.edu.tw/?p=5396>

修復的訊息： 莫拉克災後重建村的原民塗鴉實踐

演講 胡哲豪
記錄整理 楊竣宇

繼上一期城鄉通訊報導了禮納里的「城鄉違建」專題之後，城鄉關鍵詞演講邀請到了在禮納里第一線進行研究的 Valagas Gadeljeman 胡哲豪博士生，來談他的「災後部落塗鴉」研究。塗鴉實踐如何作為無法言說的災難訊息？外人看到的塗鴉作品跟災民創作者的想法有和出入？藉由胡哲豪的演講，我們可以一窺其中的複雜關係。

社會學或災害研究尚未對災後重建的「塗鴉」進行系統性調查。台灣在災害研究上，更沒有關於「災難塗鴉」(catastroffiti)的發展。胡哲豪有關於災難塗鴉的觀察，是銜接關於「災後重建」與「原民文化復振」的重要媒介。

胡哲豪透過本次講座，分享莫拉克風災後遭到遷村的原住民族人，如何透過永久屋社區內的災難塗鴉和壁畫，找回集體記憶及文化認同。這些觀察也讓抹除了外界對於災民的污名化，重新理解原民如何在陌生的土地上修復自我與祖先的關係。

回顧台灣原住民塗鴉歷史發展

胡哲豪首先引用了畢恆達(2011)的研究，從1980年代的蘭嶼反核廢料的運動中，看到台灣原住民塗鴉的歷史。今天在蘭嶼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反核廢的塗鴉噴漆，例如這個「核廢滾蛋」或是「還我乾淨土地」等噴漆標語，

都是達悟族人
為了自己世代
居住的家鄉所
發出的聲音。



▲圖片來源：聯合報網站<https://vip.udn.com/vip/story/121939/4787870>

塗鴉作為反映災難社會行動

從蘭嶼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塗鴉本身就是一個災後的社會行動。它以一種多重的方式來詮釋災難的意見表達，有著敘事的特質。不過胡哲豪認為，在學術界對於「災難塗鴉」的描述還很缺乏。對他來說，塗鴉是一種意念表達的重要形式，而且人類在很早以前就有的文化活動。史前人類就已經會在洞穴上塗塗寫寫，那是他們表達的一種方式；排灣族原住民先人也會在石板上刻畫出祖先的人頭，或者是在木頭上紀錄領袖的一生。這些圖騰或塗鴉象徵了部落的重要地位的傳承，也傳達了深層的文化意涵，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議題。

禮納里的災難塗鴉實踐

胡哲豪主要在討論的對象，是 2009 年莫拉克風災之後，屏東禮納里永久屋部落中的塗鴉。這些塗鴉或者被刮除的文字痕跡，在部落中的牆面、馬路邊、公共空間等地方都可以看到。胡哲豪想問的問題是，塗鴉訊息想表達的是什麼？這對於部落有何意義？這些訊息想要傳達給誰？

禮納里永久屋部落的緣起，是因為排灣族

的瑪家、大社部落，魯凱族的好茶部落，三個部落遭到颱風的災害，政府因此規劃了永久屋基地來安置災民。但是原鄉的災後永久屋規劃，充滿著支配者的權力、是技術官僚的工具性建構出來的異質空間。對此，胡哲豪有著尖銳的批判，他認為外來力量與欠缺族群思維所建構的空間產物，是為了滿足規劃者展現其簡化、快速造屋並降低成本而大量生產的「現代性」機能計畫。在地族人對於自己生活場域的想像，其實很難被規劃者接納，因為國家機器或者民間慈善團體支配著過於強調技術性、理性的知識，並且成為災後重建的主導力量。

胡哲豪舉出了「耕地不足」例子來說明這種情況。因為原先的三個部落被限縮在一個永久屋基地，居民可使用的耕地相對於原本的家鄉就少了很多。這除了讓三個部落之間出現內部張力之外，也讓原民的勞動條件被建制了。勞動對於他們是生活中重要的活動，而且與文化行為有緊密的相關。我們都知道原住民善於歌唱，那其實是「農耕歌」，並不是用來娛樂的，而是勞動者的身體在土地裡非常疲勞，為了提神所發出的聲音。以前在山上的耕地廣大，可以勞動一整天，現在只剩下永久屋前面小小一片，居民常常整天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座落於禮納里大社部落入口處的變電箱
圖片來源：《藝術認證》，第83期，頁39。

由此可見，在永久屋基地中，文化的行為被弱化了。真實的土地需求與規劃者所想的土地需求有很大差異，理性的規劃以及土地限縮影響著文化行為，這個新的災後永久屋部落，對於族人來說，其實是很陌生的空間。因此，塗鴉就成為居民介入的方式，成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意見表達。塗鴉其實經常是有議題的負面訊息，並不只是「好看」而已。

例如，大社部落災民再變電箱上的塗鴉母語「Marasud」（團結）、「Pazkatan」（和諧），這些文字看似正面，其實表達了族人對於遷村的矛盾心情，以及對於部落內資源分配不均的焦慮。

排灣族人與祖先的連結其實很緊密，在以前甚至會把過世親人安葬在住宅室內。雖然現在已經很少有這種葬法，但遷村前的大社部落離墓地其實不遠，族人隨時可以輕易地回到墓前懷念祖靈，甚至跟他們講講心事。但是永久屋的規劃並沒有殯葬用地，遷村之後的族人從室內葬、土葬（其實室內葬的習俗會消失，也是因為殖民時期日本政府將之視為陋習），到被迫轉換為火葬。這個議題也被大社部落的青年創作者塗鴉在牆上，表現出親人遺骸被迫與部落分開的問題。

這些塗鴉除了是問題的反映，也是族人用來懷念過去回憶的方式。新的禮納里永久屋比起原先的部落，距離市區更近了，生活也比較方便。但其實對於族人來說，生活反而變得無聊。他們以前在山上的部落中，從早到晚都有很多事可以做，不過遷到禮納里之後，「方便」讓生活變得空白。甚至，人與人之間因為貨幣使用更為頻繁（在山上相對自給自足），族人開始在意錢的往來，人際互動也變得比較現實。

青年族人們為了延續山上部落的回憶，開始把童年的記憶塗鴉在牆上，這是他們集體記憶的呈現。更進一步地，塗鴉作品也開始引起部落族人的共同討論和懷念。例如，瑪家部落青年創作者在部落入口處的塗鴉，就曾引起部落中老一輩族人的興趣。老一輩族人甚至還會堅持圖騰的階級倫理，告訴創作者不可以用錯圖騰，這顯示出了塗鴉承載著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胡哲豪的演講中所描述的塗鴉，是創作者試圖喚起集體記憶，凝聚族人對於文化認同的方式。雖然新的永久屋基地無法完全滿足實際的空間及文化需求，這些作品也讓部落的傳統有著延續的可能。



▲座落於禮納里瑪家部落入口處的面牆壁畫
 圖片來源：《藝術認證》，第83期，頁44-45。

從戲院到美術館的賣票人生 蔡明亮電影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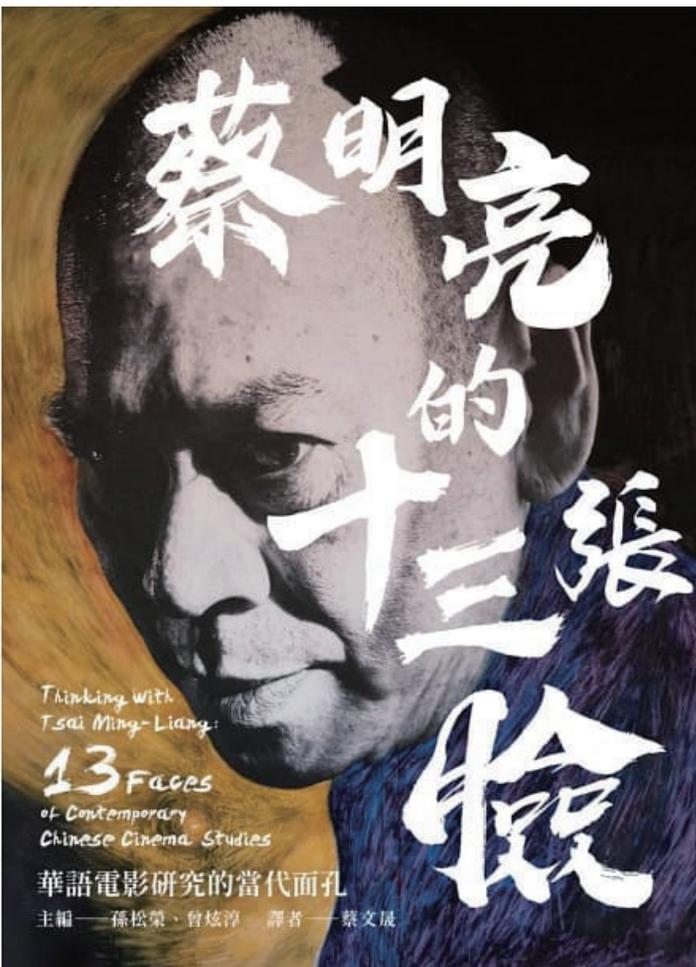


▲ 圖片來源：陳俐君技士

演講 蔡明亮
記錄整理 楊竣宇

本次講座是由畢恆達老師邀請蔡明亮導演，在《電影與空間》課堂上與同學們進行分享。從蔡導的創作形式以及歷程中，我們可以看見他身為一個「藝術電影」的創作者，如何以一種溫柔、真誠但又堅定不屈的立場，來面對俗世社會的現實問題。

蔡導演出生於馬來西亞，1977 年來到台灣。他在國際電影圈有著極高的知名度，曾多次入圍威尼斯影展、坎城影展、柏林影展與金馬獎等國際電影盛事，並於 1994 年、2013 年分別以《愛情萬歲》《郊遊》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與評審團大獎。不過，蔡導的電影鮮少在主流電影院出現，這顯示出了藝術創作在台灣社會的窘境，也是蔡導努力用他的作品及行動在抵抗的事。蔡導的賣票行動本身已經成為了電影創作的一部分，也是他對於電影圈的市場經濟最犀利的批判。



▲《蔡明亮的十三張臉：華語電影研究的當代面孔》（孫松榮、曾炫淳編）及《影像即是臉：蔡明亮對李康生之臉的凝視》（陳莘著）
圖片來源：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6664

得獎的電影壽命很短——從戲院到美術館

《洞》（1998）在坎城影展入圍，還得了費比西獎。但是當它在東南亞戲院上映時，不到一天就下片了。為什麼會這樣？我的作品是特例嗎？我覺得不是。應該大部分得獎的電影就這樣。我的電影無論有沒有得獎，在戲院上映的壽命都很短。有的時候，得獎還是一種障礙，有些人不看得獎的電影。我在想，為什麼我們的觀眾會是一個「替代」的概念，有的人年輕的時候在追影展，出社會後可能就在忙別的事，或者有別的娛樂了。

後來我的作品就去了美術館，我覺得是美術館在跟我招手。美術館是像我這樣的電影的最後一個堡壘，是最後一個可以放的地方。我

以前跟羅浮宮有合作過，羅浮宮一年大概有800萬個觀眾，其中有25%是本地居民。美術館其實是他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台灣，我們是沒有美術館的，美術館並不在我們的心裡面。

我不厭其煩地跟別人推廣美術館，這是我們下一代的問題。如果下一代出了一個蔡明亮，那他就不用那麼辛苦。我的不務正業就因此開始了，我在美術館辦深夜講堂，甚至是唱歌，讓願意來美術館睡覺的人覺得「很划算」。這種狀態出現在2013年拍完《郊遊》之後。當時《郊遊》在金馬得了一些獎，需要在戲院上映，但從此我就決定不再讓電影上戲院了。這跟市

場還有電影的屬性有些關係，我決定讓我的電影在美術館上片，後來我就跟剛開幕不久的國北師美術館合作，希望他們成為《郊遊》唯一上映的場地。

不過，電影院還是很重要，因為它還是最適合看電影的空間。或許我們應該想想，怎麼讓電影院跟美術館有所結合。戲院也要讓觀眾有美術館的感覺，不然會被窄化。

三顆星的不要看？——賣票人生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刻，某次我在絕色影城門口看到三個高中生，站在一張電影海報前面說：「這個三顆星的不要看」。當時我真的很震驚，這些觀念是怎麼來的？我認為「美學」的概念需要從小養成，這沒有「懂不懂」的問題。我們從小看商業片長大的，你以為你有選擇，但其實你是沒有的。你以為你在一個自由社會，但其實是在片商的操縱下被控制的。

我的觀眾在全台灣大概也就兩萬人以內，可能還估多了。因此我決定讓我的電影轉向美術館，而且開始自己賣票。我做了很多的宣傳，有些平面媒體也給我很多面子。後來我就自己發行自己的電影，不再藉由片商。我跟西門町一家萬國戲院租了影廳，自己跑到街頭賣票，賣到一半還被警察趕。有一次我在誠品賣票時遇到一個中年男子，跟他搭話，他很驚訝地認出我：「耶？蔡導演！」我問他說：「你有沒有興趣看我的電影？」他就說：「不好意思，我不看藝術片。」就這樣我們講了很久，最後他還是沒買票。其實要賣出一張票，有時候很快就賣出去了，有的時候卻要跟一個陌生人推銷很久。賣票賣了十多年之後，我發現其實一個月可以賣到一萬多張票。

如果沒有「電影工業」這個概念，或者這個概念再少一點，那電影創作是什麼？因為電影工業都用市場在決定，所以我們看到的電影都很像，它成為了一種模式。但是，電影可以成為一種繪畫嗎？我應該要想電影「是什麼」，如果它不是產生戲劇性的時候，它可以做什麼？我們可能就不是從寫劇本開始。





▲蔡導說明他如何在街頭賣票
圖片來源：侯志仁教授

「沒有人在幫我翻書。」——電影是什麼

「電影是什麼？」這個問題有很多轉彎。你們現在看到當下的我是最不懂得「電影是什麼」時候的我。

2003年我在拍《不散》，這是我的第六部電影。前面三部是有劇情的「中影三部曲」，那三部是關於生活的，對觀眾相對簡單。但是後來我的電影就開始想拍什麼拍什麼，像有陣子就很想拍李康生，有陣子就很想拍戲院空間。我在永和遇到了一個戲院叫做福和戲院，它在一個市場的樓上，是一個千人的大戲院。這個戲院因為太大了，不符合現在的市場需求，已經準備要關閉。我把戲院租了下來，跟李康生一起拍了《不見》《不散》。整部電影就是一直在拍這個戲院空間，戲院裡同時也在放電影，因此電影裡包著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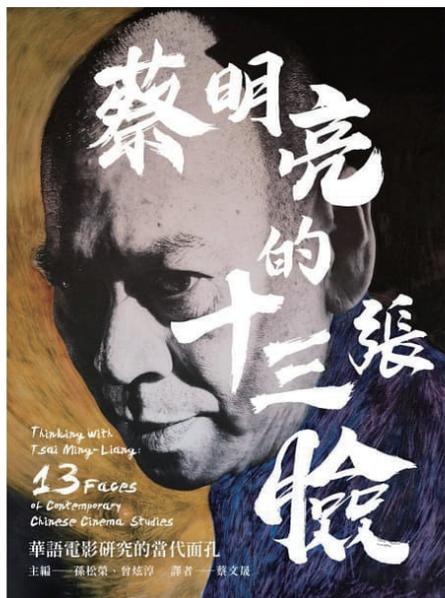
這部片在威尼斯影展首映時，有個觀眾告訴我：「近十年來我所有看的電影，我都有一種感覺，不管是感動、喜歡或不喜歡，都是好像我在閱讀，但有個人在幫我翻書。但是看你的電影沒有這種感覺，你的電影夠長，所以我思考了。」聽了她這麼一說我才發現，原來我是在「凝視」這個戲院，你問我為什麼這個鏡頭這麼長？我就想多看兩眼嘛。你問我怎麼決定？我會告訴你，這是我的作品所以這是我的事。

又有一次在絕色影城映後的時候，一個18歲的小孩舉手跟我說：「導演，我在你電影裡看到了顏色跟聲音。」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每部電影不是都有顏色跟聲音嗎？其實我們看電影永遠都在看一個故事，舉例來說，你看一百次反戰的電影都會很感動，但是戰爭還是一直在發生。這是為什麼？這種電影可能只是一種比較輕佻的娛樂，作者可能已經不見了，還是這種電影可能不需要作者？我很喜歡法國的「作者電影」概念，即便是商業片，還是要呈現作者。我想說的是，我應該去思考怎麼在兩小時裡「呈現一個作品」，而不只是在「講一個故事」。

蔡導推書：

《蔡明亮的十三張臉：華語電影研究的當代面孔》

《影像即是臉：蔡明亮對李康生之臉的凝視》



最近出了兩本書，第一本叫做《蔡明亮的十三張臉：華語電影研究的當代面孔》。這本書是很多個研究我的學者的文章集合，其實很多我看不懂。他們引用很多理論，例如班雅明或拉岡，他們都很厲害。不過雖然我看不懂，我還是很開心，因為他們在討論我的作品。

另外一本書《影像即是臉：蔡明亮對李康生之臉的凝視》是一個南藝大博士班的學生陳莘寫的。那時候我身體不太好，在南藝大兼課，我要求我的學生每周來台北上課。我說我是一隻孔雀，每次來上課都開屏一下，學生都說我只是在喃喃自語。2011年的《只有你》作為一個舞台劇，朝生暮死。但是李康生走路這麼好看，我要記錄下來，就拍了行者系列的第一部《無色》。那個女同學就因為看了《無色》，開啟了這本書的寫作。



Jeff Hou——和畢恆達，在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3月24日 · 台北市 ·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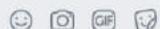
聽完蔡導講述心路歷程，作品內涵一次豁然明瞭，很慶幸沒有錯失這個離研究室幾步之遙的難得機會（感謝畢老師臉書公告）



讚

留言

留言.....



Lily Chen

3月24日 · 人



下班以後來上課，聽蔡明亮導演演講。



於是乎，那些年誰的畢業設計、國北師美術館的午夜展、那些拍片的人事物……猛然歷歷在目，因為和自己的青春歲月疊合了，在聽他各種創作嘗試的時候，也感覺到某一塊乾涸被灌溉了。



渴望那個靈魂猖狂卻不帶刺，柔軟卻不溫順。



生活變得像李康生的脖子，越是讓人懷念那個說起來閃閃發光的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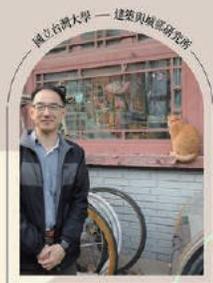
讚

留言

留言.....



▲演講小心得。來源：侯志仁教授與陳俐君技士。



王志弘 教授
◆主講人



劉俊裕 教授
◆主講人

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

台灣文化治理研究的十年路線辯證

2011

2021

04/

01

19:00
-
21:00

「文化治理」一路走來的發展與學術辯證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
220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 教學研究大樓 5F

文化治理：

演講 王志弘
記錄整理 姚麗金

邁向生活網絡與基礎設施化¹

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十年對各位其實頗為漫長，但我們可能感覺一下子就過了。今天要在有限的時間裡面交代十年的演變，確實有點困難，我盡量精簡。

| 三十年軌跡：如何理解台灣社會的轉變？



1. 本文係王志弘2021年4月1日在台藝大藝政所進行的〈台灣文化治理研究的十年路線辯證（2011-2021）論壇〉演講實錄。

首先，這個十年可能不夠，我一下又拉出了三十年。1991年，我的碩士論文做了移動研究，之後就一路發展這個議題。值得一提的是，我退伍以後，一開始還是想要順著博士論文談的移動／流動，做捷運的課題。但我很快發現，捷運不只是都市經驗，而是新的文化環境。這引發了我對台北市文化政策轉變的興趣。最早是在《台北畫刊》的歷史性考察中，提出文化治理的概念。2003年，提出台北市文化治理轉型。隨後，帶著研究生做了地方發展與文化治理的研究，出版成書，並試圖將文化治理概念理論化。2011年（4月1日的文化治理對談）也在這個軸線上。中間有上下交錯，2006年回來研究東南亞族裔地景課題，直到2015年以後，繼續發展文化治理及其他概念。

待會，很快帶大家回顧一下從都市文化治理轉型，到文化治理的概念化，以及本來是做文化治理的政策分析，後來逐漸跨領域到文化治理與地方發展、社會運動、文化產業和勞動的串接。至於前瞻，就如我今天的標題所示，特別是談到文化創意產業與勞動的時候，我逐漸發覺，其實我們應該回到日常生活。日常生活非常複雜，也試圖跟我2017年開始做的基礎設施研究對話，提出文化的基礎設施化的概念。我的主張很簡單，即我們最好是要從事日常文化實作及其「社會－物質動態」的研究。

我的研究成果按顏色分成三個領域，晚近開始談基礎設施，大家看過往的論文，其實可以注意到有個名字叫高郁婷，她出現了八次。如果十年後還有論壇，那就知道要找誰來談了。

| 從都市文化治理轉型，到文化治理的概念化

首先，文化治理的轉型與概念化，從台北市的轉型，談到更廣的台灣國家－社會關係轉型下的文化治理，乃至於在官方出版品、或是像大文山地區的地方文化再現與地方轉變的關係的探討。概念化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從2010年到後來，有一個重要改變，就是從文化政策和文化經濟來談文化治理的運作，後來多了文化與社會關係的探討。

如果要說和劉俊裕老師有什麼交集的話，我還記得，我幫劉老師的書寫序的時候，格外

地想要和他劃清界線：我們城鄉所要講衝突，這就涉及到後來一篇試圖呈現文化治理的衝突和政治社會經濟關係的論文（《文化治理的內蘊衝突與政治折衝》（王志弘，2014）），同時也想往前拉到文化治理背後的價值與文化權利，這也是應劉老師的邀請而寫的作品。我還記得，那天在劉老師研究室，提到這個構想的時候，劉老師馬上把他的一個草稿翻出來，我們赫然發現，他的圖和我的圖長得很像。

| 從文化治理政策分析，到文化治理的跨域串接

跨領域的部分，這本書《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是學生碩士論文的改寫，談到台北、宜蘭、新竹、高雄的案例。在城鄉所的脈絡下，我們會關注社會運動如何一步步弱化或深入。針對剝皮寮，像反拆遷運動與歷史保存運動的功與過、得與失是什麼，乃至於更廣遠的暗黑或創傷地景，如何在都市發展過程中，不管在韓國光州，還是台灣高雄，都捲入了都市文創發展的脈絡。在更微觀的層面，徒步導覽成為我們召喚的新記憶地景的媒介。文化勞動方面，書籍封面設計、室內設計師的不同職業處境與自我定位，以及最後，連零售商、連夜市都開始了文化化。不只文化是門好生意，我們甚至可以說，生意也變成了一門好文化。族裔餐廳的崛起也是一個例子，它不只是以文化來做生意，也是以文化來凝聚召喚認同。

| 文化治理與日常生活的糾纏（底蘊、慣性或救贖？）

這些張力就讓我去思考，在談非常多文化治理或文化政策之外，應該如何更貼近思考實際上文化在我們的生活中到底意味著什麼。在這個脈絡下，我試圖去談官方所要凸顯的正統文化，乃至於本土化，以及吸納的庶民文化，這三者之間的關聯。

如果要談文化到底是什麼，有個簡單的區分是，它是我們的「慣性」，即日常生活中習慣的看待事情的方式，乃至於人類學意義下的生活方式與認同的問題。但這裡會有一個張力就是，我們在一個越來越多跨界交流的時代裡，這些他者／異類不斷跨界過來，我們不管願意或不願意，都越來越需要面對如何與差異共處

的課題。所以說，「慣性」必須鬆動嗎？還是在面對他者差異的過程中，反而更加鞏固了？在鬆動與鞏固之間，我們引發了一個「不只是日常生活，也是文化治理」的課題。

另一方面，很多人在談文化或文藝時，其實在談的是「底蘊」這個概念，它是典律，是傳統，是素養，是從美學角度來思考。我們也經常寄望藝術創造與前衛實驗，如何可能在底蘊的基礎上發展出來，化舊為新，這是非常多文化產業的發展焦點。但是，不管是主流的力量，藝文前衛的力量，或是社會轉變的企圖，都有可能將文化拉往「救贖」的方向，它可能是我們日常生活的救贖，期許它更富有意義，甚至可以神聖化。當然，在座很多可能都曉得，David Harvey 這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所談論的資本積累危機的文化修補可能性，乃至於在現代性底下越來越理性化的趨勢，但這個理性化導致韋伯在講的「鐵的牢籠」作用下，如何既去除神魅又返魅的過程。這是一種超越性的追尋，在這種超越性裡面，經常既想要治理又無可治理，用我的話來講，這是一種價值爭戰。

文化何為？需要治理，又毋需治理

如果把它拉得更廣遠，就是「文化作為生活」到「文化作為救贖」，不只是慣性或底蘊，它越來越成為文化經濟中的生計或產業。文化的救贖可能是個人的創業和自我實現，也可能是具有社會轉變企圖的介入，乃至於創造性期許，在這裡面，價值不斷生成、提升、轉化、超越。但價值是雙向的，面對不同價值，利益也被納入。並不是因為文化作為生計／產業之後，文化就有了什麼，而是生計和產業向來是人類生存之道，是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領域，裡面牽涉的利益可以成為互不相讓的價值協商機制，所以我特別將價值與利益放在一起。但我們到底是要邁向與價值對立的利益競逐，或是價值協商與意義構想，當然是一個大哉問。

在這個脈絡下，劉老師說，我有一篇文章，回溯過去二十幾年的都市區域發展中的文化策略。簡單說，這個發展是從地方營造、社造，再到地方創生，我們期待社區有自主意識，但是看到裡面的多重張力，以及揮之不去的發展



▲演講現場。 攝影：王歡

意義。在城鄉所脈絡下，地方文史的踏查，各類歷史記憶再現，也呈現了越來越多的歷史空間再利用的襲產策略，但裡面的傷痕和焦慮揮之不去。大家熟悉的各類藝文館舍、大型節慶展演，既是展示，也是競賽，是統括在創意城市之夢下的都市發展中，創意群聚、文創園區與創意階級，在其中如何自處的問題。我彙整了台北大都計所、台大城鄉所、台藝大藝政所，各自在這個脈絡中過去二十年來提出的不同概念。台北大都計的辛曉教老師提出的文化生活圈，到林文一老師近年在發展的文化創意群聚與創意城市的批判。城鄉所一直講社會參與，談市民抵抗。藝政所則在談公共領域，談文化權，乃至於劉老師的再東方化。這些概念的確意味著我們有多重的路徑，但這個多重路徑下，有沒有可能順著我剛剛在談的，順著對日常生活複雜性的更多關注，提出生活支持網絡的分析與重建的問題。

每個機構的研究都有其社會介入的企圖，在不同領域和方向上。彼此之間也有交流，像我跟台北大都計所的林文一老師，以及他們幾個現在在教書的博士，也算熟，城鄉所的殷寶寧老師現在也跨領域到台藝大。所以，我的立場是，如果你承認文化就是生活，但台灣各地文化千奇百怪，千差萬別，各地的生活到底如何運作，如何獲得支持而得以運轉或改變，其實還沒有清晰的圖像。現在要反省，做了這麼多年的相關政策和理論探討，但台灣各地的生活實況仍然不甚清晰，因此我們或許不必先將文化當作一種策略來談，而是先探討文化與生活到底是什麼，也就是要跟文化人類學或文化社會學靠近。

其中的一個核心是，特定的生活如何得以成形和轉變，我認為其中有一種支持性網絡和條件。支持性網絡看起來理所當然，宛如背景，不太容易覺察到，但實際上，是支持、串接、構築起我們的生活紋理、軌跡和節奏的那些物質性、社會性與象徵性的設施、裝置、關係及符號的複合體。其中，最穩定的部分，我把它稱為「文化基礎設施」(cultural infrastructure)，國外有些學者也把它叫做「社會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我們的社會如何運作、該往何處去的發展問題意識，以及

文化策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必須奠基於對既有生活支持網絡形態的深度掌握，才能循此探索與構想文化及社會基礎設施的重建。

| 文化的基礎設施化與文化網絡的深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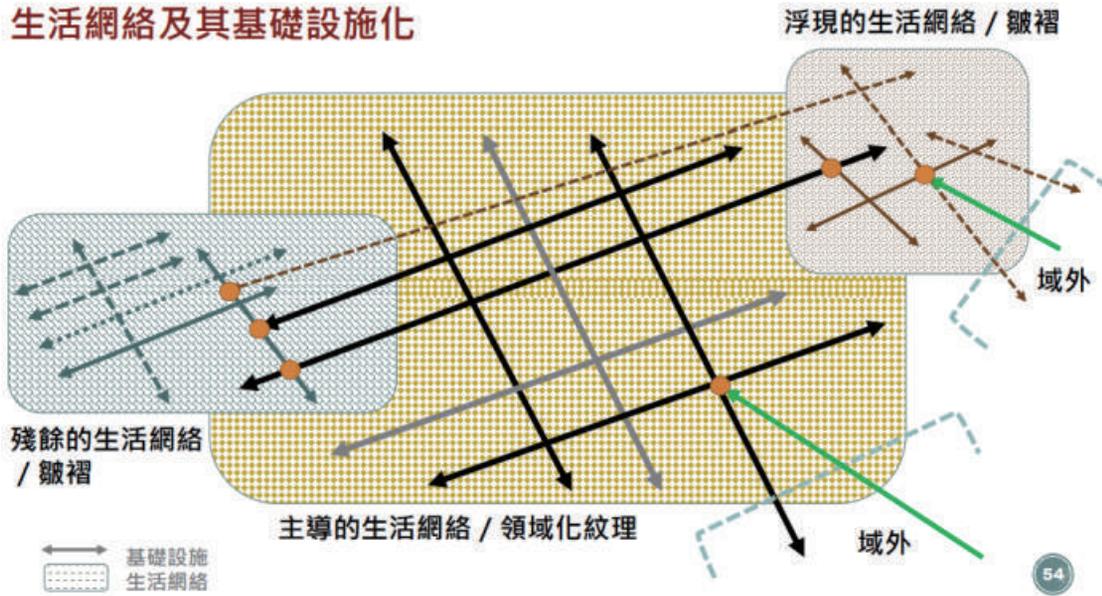
這就來到了最後要談的文化的基礎設施化與文化生活網絡的探究。這要從我早期做的道路研究開始說起。馬路很複雜，與社會有關，從結構，到人的實作；也跟技術有關，技術作為科技系統，到如何部署在道路交通、斑馬線、法規，到我們怎麼可能改變這個道路。針對空間向度，我們使用領域化概念，這是將生活穩定組織起來的邏輯，還有看得見、摸得著的紋理與節奏，以及稀奇古怪的不經意的皺褶來擾動紋理，三者放在一起談。這就形成了一個我把稱為「基礎設施化」的架構。

基礎設施並非單純的科技或物質人造物，現在人類學界在談的是，這是一個建立、連結及維繫關係的過程。基礎設施是事物，但也是它們之間的關係。它的功能是讓跨越空間的交換得以成立，它構成了觀念、財貨、人員，而權力在其中交融。最有趣的是，因為是人類學，所以它會注意到基礎設施與權力的密切關係，這就形成了基礎設施政治，同時它跟各式各樣的象徵、意義、再現有所連結。

我們看到，翡翠水庫多麼的宏偉，小學生都要去參觀，石門水庫也一樣。這些大型基礎設施往往成為國家宣揚政治政績或現代紋理的表徵，這是一種詩學，是意義的操弄。因而基礎設施就開展出了一個還蠻複雜的新課題。放在文化裡面，我們原來在談的文化治理體制放在上面，下面是新跑出來的生活網絡，領域化邏輯、實際部署，還有精密的皺褶擾動，共構了一個「文化基礎設施化」的過程。

我最早用這個概念談的是藝文場所。藝文場所具有多重特質，它是地景、公共領域、烏托邦等。比較重要的是，它作為一種官方文化的領域化部署，歷史再利用下出現的新紋理，像西門紅樓等等，還有我們可以稱為「民間皺褶」的新的藝文場所，這種雜然並陳的狀況，用文化基礎設施，而不是官方在用的文化建設來思考，就可以看到其中的複雜性。其實，每

生活網絡及其基礎設施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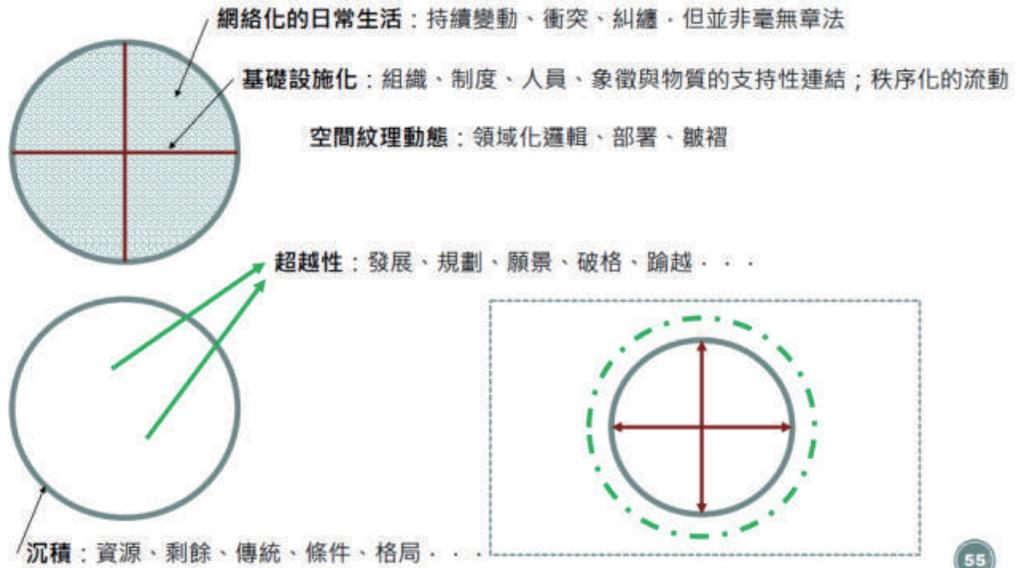


個場所都在說話，女書店在說的話，和故宮宿舍在說的話不一樣。我們通過晚近熱衷旗艦型館舍和鉅型事件的操作方式，看到展布在日常生活中，塑造我們文化生活網絡的基礎設施是非常多樣的。

另外一篇文章在談民間補缺型藝文空間遇到多重質疑的困境。也許文化治理給予其多重治理和補助，但在都市治理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和建築法令中，可能面臨某些危機。這種藝文空間我稱為「文化準公地」，它框在市場之中，比如說是一個獨立書店，就會有辦論壇兼賣咖啡的功能，它有它的盈利要求，但面對國家的補助或管制，它在公民社會中發揮了一個共域或公有地 (commons) 的一個交流場所的作用。很多 live house，比較有活力，你會抱怨它的噪音，或者它要靠賣酒，才能維持生存，和獨立書店很優雅的像我這樣坐在這邊講講話，或喝茶或咖啡的那種氛圍是不一樣的。談及飲料的差異，酒就會特別受到臨檢管制。那麼，我們關切的民間皺褶，會遇到什麼基礎設施配置上的問題？有些本來具有功能的交通基礎設施開始文創新生，鐵道是非常有名的例子。不管是台北鐵道部博物館，即將成為博物館的台北機廠，高雄海岸開發中的鐵路歷史元素，彰化扇形車庫和鐵路醫院，有名的台東舊車站的發展等等，都是基礎設施的遺產化和文文化。

如果要談基礎設施，其實我們馬上會遇到在台灣非常有正當性的交通道路和基礎設施。當交通道路或基礎設施上面，有我們關注的歷史文化遺址的時候，往往就必須有所退讓。開闢敦化南路的時候，遇到了林安泰古厝；有名的迪化街拓寬的例子；新北投車站移回彰化又移回來，要移到原位，還是要順應已經改變的路型，往旁邊挪一挪；還有三井倉庫前幾年的爭議，這些案例讓我們想到：原來的模型也許是道路是道路，遺產是遺產，一步都不能退讓，要保留在原址，但是在原址就會變成一個單點。面對有強大的正當性，以及安全和效率需求的道路基礎設施部署，你如何抵擋？因而我們的文化歷史也要基礎設施化，要在道路和遺產的爭奪中，看到背後都市意義的衝突，在新的都市意義和都市該如何運作的理解下，各式各樣的歷史和文化應該糾結在一起，成為文化的基礎設施，才能凌越或協商與道路之間的關聯。

為此，我畫了個圖。幾個色塊都是「生活網絡」，都是「紋理」，一條一條的是「基礎設施」。我們可以借用 Raymond Williams 的觀點，區分殘餘、主導和浮現的不同狀態。過去的傳統產業對當代而言是「皺褶」，主導的生活網絡和領域化的紋理，以及正在浮現中的藝文工作者或其他不同社會生活場域，則正在實驗的新的可能性，它們各自都有對應的「域外」，可能是國外或別的地方。那些虛線就是正在形



成或正在凋零的基礎設施，大家看到最左邊的殘餘的傳統部分有虛線，和右邊的我故意畫得亂亂的部分，就是指它們還在成型中。

這種浮現的生活網絡和皺褶如何有效地基礎設施化，接軌到主導到社會生活網絡，形成一個具象設想的文化生活網絡和基礎設施化？如果要把它抽象化就會變成這樣，十字是基礎設施，圓圈是網絡，網絡日常生活不斷變動，但不是亂七八糟，不過我們還是要仰賴基礎設施把它支撐起來。另外，人們總是有超越的慾望和企圖，他們管這個東西叫發展，叫破格，叫凌越。如果將這兩個圖組合起來，就是右下方的圖，綠色是往外擴散的企圖，這或許可以拿來當城鄉所的新所徵。

我正在嘗試的文化基礎設施化研究，當然不是憑我一人就可以做到，那剛好有三位博士生，我把他們稱為文化基礎設施化研究的戰鬥序列。高郁婷快要改完的博士論文，談彰化的新興文創網絡如何有其日常空間的基礎。王瑤談福建培田的歷史文化名村，她用社會物質拼裝概念來談宗族社會下的歷史文化名城的復古，中間還有文化基礎設施的搭配。賴子儀在談基礎設施的文化化，利用屏東、台北天母的兩個案例，講灌溉供水等水利基礎設施如何歷經轉化，成為動員社區、重構人水關係的新文化基礎設施。

我們開創的是一個基礎設施文化化和文化的基礎設施化的構想。我刻意用一個我常年關注，但大家覺得不是文化的議題來談。像走路，台藝大周邊的人行環境，我注意到已有一些改善。這個徒步移動的基礎設施如果既安全，又舒適，有遮蔭，不會有很多障礙物，能辦到這一點，台灣就是一個有優良文化的地方。因為好的交通基礎設施和軟硬體支持的移動，支持重視了人命價值和有尊嚴生活的文化習性。所以，基礎設施支持良好文化，尊重的文化也體現於基礎設施中。

另外，大家都關注的氣候變遷議題也是如此。它要求我們調整人與自然的關係，來重塑生活方式與基礎設施。比如說，河堤的配置要有所不同，但是文化也可以捲入其中。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這個，比較悲慘的前景是，我稱為一種淪為武裝化的社會的相互對抗。這種武裝是用各種資源裝備來自保，並且在自保過程中排除了他人。文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到底是差異共榮，還是相互攻擊，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以上。

| 答現場問

最近有新的發現，之前我以為我跟劉老師的差異在於，我比較凸顯衝突，但今天劉老師刻意說，我們也有很多抵抗和衝突，所以必須再畫出新的界線。這個界線在於，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劉老師主張，從工具理性一路超脫到文化理性，文化治理還不夠，要邁向文化經世，文化治理不應該只是一個工具，它應該還是一個目標，因而文化治理不只是治理文化的事物，而是要達到一種文化邏輯的高度。我個人對這種目標卻沒有太在意。大家可以看到，我從文化治理轉向日常生活，就意味著可能要把藝文館舍、藝術創作當作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換言之，就是去神聖化。我也常跟我的學生說，我其實是一個非常庸俗的人，要不是老婆拖著我，根本不會去故宮看展覽，我經常看《變形金剛》這種很爛的大片，藝術電影我一看就會睡著。

Q 在事物發展趨於破碎化的當下，進行結構性討論的意義在於？

回到後面的問題。為了吃鮭魚改名字，這個事件背後有一個大哉問，這是不是意味著一種破碎化，沒有宏觀結構的趨勢了？反而我們這些做研究的人，才偏偏愛講一套結構性的大道理，把東西框在那邊？但一般人就是亂七八糟，名字愛改就改。不過，大家要注意，大部分人的名字都改回來了。鮭魚實踐背後依然就是一個行銷邏輯，對應的就是想要搶便宜的邏輯。邏輯就意味著一種結構性的力量，並沒有超乎政治化。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我們覺得好像脫離某種主導秩序和想像的東西，但我個人比較喜歡批判實在論立場，就是在表象背後，好像還有一些深層的、我們要加以掌握的趨勢，那個東西不太容易改變。我們可以從剛剛提到的幾十年前的林安泰古厝易地重組案例看到，我們的都市社會是如何結構起來的趨向，確實沒有很大的改變，但這不否認發展有所改變。但你提到的新世代的稀奇古怪的、或碎片化的東西，在結構趨勢的調整上，確實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這就是我講的皺褶。皺褶經常會被主導力量撫平，不過，有時候皺褶會轉化成紋理，紋理會成為新的領域化部署邏輯。

有人提到 STS 嗎？對，因為我去念了一個 STS 研究所，注意到一般人文社會科學過去沒有那麼強調的物質性，進而提出作為社會物質的基礎設施概念。是有這個影響，沒錯。但剛剛也許不是作為問題，而是作為觀察，提到了《台北畫刊》對都市視覺性的關注，這個視覺性成為官方透過出版品的機制，馴養著我們一般人如何看這座城市，但晚近到設計之都，談設計美學到變電箱的美化，最近五年和高郁婷合作談設計治理，談設計美學在都市環境中如何越來越受重視，不過比較不是從視覺，而是從氛圍切入，這是更徹底的治理術。

Q 理想生活／社會要扶持誰作為能動者？

我個人可能沒有資格說要扶持誰。這類該怎麼辦的問題，我在城鄉所常用八個字來回答，啟蒙組織動員抗爭。各位新生代想要什麼樣的理想生活，比我們這些老人想要什麼樣的理想生活更重要。當老人想要理想生活的時候，他就是要把你們的納稅錢，變成養老錢，所以不要問老人要什麼理想生活，而是問你們要什麼樣的理想生活和社會。如果各位有好的想像，啟蒙就是自我啟蒙，啟蒙大眾，大家一起來努力，要組織，要動員。

Q 政府在文化治理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

其實簡單講，我不覺得現在台灣政府已經有文化治理的能力，大概還在文化管理的階段慢慢摸索。我們公務員的培訓，政府機構的運作方式，以及各種法規規定，使得即使是有理想的公務員，都還在被迫要管理他們脈絡下的事情，還未達到文化治理、文化理性層面。政府具體而言在做什麼，我也蠻感興趣。我不斷遊說幾位同學來寫這個題目，但是沒有人要寫。把文化機構或一般的政府機構當作人類學的民族志田野，看到這個機構裡面到底在幹什麼，裡面的愛恨情仇，不甘不願，某些誇大的願景交到基層手上的時候，是如何操作的。我們缺乏對政府實際運作的詳細探討。在那之前，我也很難去說政府在文化治理中該扮演何種具體的角色。

就此來說，我覺得台藝大藝政所這邊有非常好的條件，你們提到有很多人是公務員，在機構中其實關注自己在做什麼。

Q 以文化與攝影的典藏為例，如果只是成為被特定專業框限的知識，那麼個人或社會該怎麼辦？

這是一個參與問題。從早年打破館牆的生態博物館，到晚近的參與式博物館、公民博物館，已經指引了很多路。我們目前的操作機制中，習慣就是找一些專家學者，還沒有西方已經在談的公民博物館的運作可能性，頂多就是做做問卷調查、意向調查，了解一下觀眾想看什麼。或者，假想互動式展覽大家可能會感興趣，所以就把博物館做成遊樂園。另外一方面，越來越多草根專家、知識分子對攝影或其他議題有自己常年的研究，第一步，倒不是問題問及的，被專家壟斷的知識要如何打開，而是期許在挑選典藏審議評論委員的時候，不再那麼相信大學教授的這個身份，攝影方面的專業人士需要進來。對面目模糊的大眾而言，他們攝影的經驗可能是自拍或家庭照片等等，在策展方面，大眾記憶的捲入，或許也可以成為一種可能。

你把林安泰和三井倉庫的興建叫做破碎，但是這兩棟的遷移所處的時空背景並不一致，後者在治理上，自主性其實很高，破碎這個講法我不接受。官場現形記讓人印象深刻，常常是流水的政務官，面對科長科員這些鐵打的事務官，所謂的學者是否可以進入戰場？

這兩個案例的做法都是拆除和異地重組，這一點而言是類似的。放回彼此差距數十年的台北都市發展脈絡，其實有很大不同。我的文章其實有談到這個都市發展的差異，市民社會的崛起，也和林安泰古厝的年代差很多，我僅僅是說，它們在形式上都是拆遷重組，但放回去看，是不同的。

放長遠來看，三井倉庫和林安泰古厝表面上看來結局一樣，但林安泰古厝那個年代是戒嚴時期，能夠發言力保，說不可以完全拆毀，敦化南路可以用地下道的方式建設，大概都是學界為主。但是到了三井，就不全然是學界，而是各種各樣的聲音，這是台灣市民社會的崛起。

早期台灣沒有文化局，文化相關的事務經由民政局管涉，提倡節約拜拜、要移風易

俗的這種社會教化的框架，再到國民須知、新生活運動的這種管訓。一直到台北市有了文化局，而後各縣市效仿，在公務人員的專業裡面，有越來越鮮明的文化行政支系。所以拉長眼光來看，好像也沒有那麼悲觀。加上還有台藝大藝政所的培訓。現在好像什麼都是破碎化了，但是我們年紀比較大的人，會從比較長遠的眼光，從過去看到現在，長遠的發展，也不止一條。這些趨勢，有好有壞，我們也看到一些可能性。

Q 回到研究所，未來十年研究學術性場域有什麼可能生產？

十年後，2031年，我剛好退休。這幾年指導的博士生比較多。新一代的學者成長茁壯，十年後應該就沒我的事了吧。

每個世代有每個世代的議題，展望未來十年，很多人可能覺察到，文化可能不是最關鍵的，台灣正在一步步更深地捲入中美新冷戰的格局，這是影響未來至少十到二十年的地球大格局。另外一個是，已經醞釀很久的，比如這幾年的野火，超強降雨，颱風，都在告訴我們氣候變遷的重要性。我只講兩個。中美新冷戰，會把新一代當成戰火的骨血絞碎，還是有可能在緊繃的戰火格局下，開創出有尊嚴的新格局？這是大任務。氣候變遷也是。我在簡報的最後，刻意把氣候變遷帶出來，先不談文化治理、文化經世，最根本的是有尊嚴的生活這件事情。面對氣候變遷，廣大群眾如何有可能有尊嚴地生活？中美新冷戰格局下，我們可以做什麼，文化在其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這是未來十年，大家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至於很多人在關注的數位文化時代，AI 智慧、登陸火星之類的，反而是其次，它們可能會裹挾在全球新對抗和氣候變遷過程中成為幫兇或解方。同樣的，文化在其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AI 有文化嗎？可以有什麼樣的文化？無人車、智慧城市也是如此。

Q 公務員需要什麼樣的文化？

來讀台藝大。研究生來念碩博，最大的收穫不見得是知識上的啟發，或硬弄出一本論文。大部分論文，包括我自己小時候寫的論文，大部分沒什麼價值。重要的是你們在這個過程中，開始聯結成網。新竹文化局的來，新北的來，高雄、屏東、花蓮各地教育局、文化局、中央等等，這是一個培力的網絡，精英一點可以叫做成長團體。就像幾十年前女性主義的第一步，意識覺醒，別人看起來像是一個小圈圈，擴散出去實際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這個成長團體，或者是台藝大培訓班，或許是一個自我培力的可能性。

濕市場的全球摩擦： 台北雙連市集的遭逢 與跌撞

謝一誼博士

紐約大學東亞研究博士/交大客家
文化學院博士後研究

2021/4/16

工綜R311.10:15-12:00

NTUBP「市場、城市、交換流動中的城鄉鏈」課程專題演講

演講 謝一誼
記錄整理 傅 裕

▲圖片來源：NTU-BP 市場、城市、交換流動中的城鄉鏈課程臉書社團

謝博士對於整個菜市場研究的切入點，來自於英文詞彙「Wet Market」。台灣習慣稱之為「菜市場」或是「傳統市場」。「wet market」這個詞彙來自於新加坡 1970 年代對於市場新型管理模式發展時對傳統市場的稱呼。但這個詞彙隨著 2020 年三月間，COVID-19 開始全球大流行時，逐漸被恐懼化與污名化。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這一個「Wet Market」作為 COVID-19 第一個被發現的動物傳人的傳播地點，在還沒有被證實是否是疫情爆發趨勢的罪魁禍首時，使得所有的「Wet Market」成為了國際之間的攻擊對象。華南海鮮市場之後，亞洲的傳統菜市場是否會成為下一波國際傳染病的爆發地？這樣的討論逐漸在政治、生態與防疫等議題上出現了很多新的爭辯。

在疫情從中國開始蔓延到歐洲與美國的時候，歐美出現了一種對「Wet Market」的焦慮與想象的投射。美國諷刺插畫家在創作插畫作品時將傳統市場描繪成髒亂油膩的場所，是病毒的溫床與製造機。他將新形態全球傳染性病毒與菜市場的意象結合在了一起。人們對於「Wet Market」詞彙的投射有了驚人的轉變。

而「Wet Market」這個詞彙本身，是相對於「Super Market」超級市場的概念而誕生的。新加坡炎熱的氣候使得有冷氣的、明亮的室內超級市場誕生，而傳統的室外開放型市場，則因其販售生肉、海鮮，而沒有冷凍櫃又需要冰塊與水沖洗攤位的濕漉漉的狀態，被形容為「濕市場 Wet Market」。「潮濕」這樣的感官現象它是如何被賦予社會性與文化價值性的呢？



▲萬華黃昏市場。攝影：傅裕

在謝一誼博士的理論關懷中，為何「潮濕」這樣的狀態在國際摩擦中成為一種必須要管理的因素、為何令人厭惡與病毒化的判斷價值觀會被附加在「潮濕」這一生態現象，成為其核心論點。

美國共和黨議員 Lindsey Graham 曾表示，如果中國不取消所有的菜市場「Wet Market」，美國就應該授權總統制裁中國。同樣，Paul McCartney 也站在國際保育人士的姿態上表示我們應該關閉所有前現代的、中古的傳統市場運作。歐美開始攻擊亞洲傳統市場是一種動物殘忍的場域等等。而我們該如何關懷這樣的全球摩擦？

縱使有學者也發表文章澄清，傳統的濕市場並不是野生動物的販賣場域，也並不是病毒傳播的起源。病毒的傳播是那些鮮少與人類有接觸的野生動物，通過被食用、或是透過第三種動物（鳥類、蝙蝠等）的接觸進行間接性傳播。但傳統市場已然變成了 COVID-19 的疫情爆發敘事，疫情爆發的責任轉嫁到了傳統市場之中，轉嫁到了

會與動物屍體接觸的人的身上。而疫情爆發的敘事被如何說明，將會直接影響到未來的管理與決策，甚至改革。但什麼是改革？又為什麼要改革，是我們該慎重思考的。

Georges Canguilhem 曾談論到，我們要如何理解正常與反常，又如何判斷我們需要改革？改革意味著事情的不正確，但這個不正確是在功利主義的不正確，還是道德的意義上不正確？又或者是社會規範上的不正確（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2007:207）。The norm 這個詞彙往往指涉到學術性的常態，但 the Normal 則更為流行性的對於何為正常的判斷。而這種對於 the normal 的辯論往往在社會發生危機時更為顯著。如今我們一直在談論的日常，以及後疫情的日常，也更是如此。

事實上華南海鮮市場是一個高度被規制的交易市場。他是一個由地方政府建立，佔地面積近 5 萬平方米，內有 5000 多個店鋪的超大規模批發商業區。這是中國經歷改革開放後形成的產物，

與歐美國家攻擊的所謂「Wet Market」的想像其實相距甚遠。甚至市場內的資金運作，不僅來自於武漢，更有北京上海等多家大型投資貿易公司在運作。所以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問題並不在於是否需要被國家規範，但問題到底在哪呢？將其放入中國資本主義的脈絡之中，Rob Wallace 在《Big Farms Make Big Flu》中以社會經濟學的面向去談論中國大陸南方是如何成為新形態病毒的爆發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肉品食用量暴增，背後都有外國資本的支持與投資。不斷地進口肉製品與建立超大型肉類加工廠，都是都市化與市場化的交匯結果。城市不斷向外開發與擴張，侵吞了非常多的綠地與濕地。但綠地與濕地是各種遷徙性候鳥與野生動物的重要棲息地，這些綠地與濕地讓野生動物與人類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可隨著都市的發展，逐漸出現了人類與遷徙性野生動物爭地域近距離接觸的現象。

面對如此多對於當代亞洲傳統菜市場的攻擊，是否能夠用民族誌的切入點去與展現傳統市場的真實面貌？雙連傳統市集成為謝一誼老師目前的關注點。

雙連傳統市集位於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 45 巷，周邊都是高密度住宅。在 2020 年文昌宮對面公園空地需要整建之前，雙連市場一直是攤商自由擺攤的集市點。但近年來由於城市火災消防議題、生物安全與都更計劃推進等種種議題之下，雙連市場的攤販存續與正當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戰。

在社會學中，街頭攤販這種不穩定 / 飄零 (the precariat) 的社會情況，被論述為「The Dangerous Class」(Guy Standing 2014)，是最為鬆散與無法組織的人群。但雙連市場的攤商自發成立了攤販自治會，為了能夠留下來擺攤出謀劃策，亦做出許多努力與改變，最終得以暫時求得一席之地。

各方力量拉扯的過程中，雙連市場展現了兩個濕政治：濕勞動與濕共生。

市場裡來自社子島的老伯伯原本在社子島的工廠工作，而隔壁攤販的阿姨之前是紡織廠的女工。台灣後工業轉型，整個製造業消失的時代背景下，工人們要何去何從？這些勞動者並沒有消失，但台



▲苑裡菜市场外圍的攤販。
攝影：傅裕





▲苑裡菜市場周邊延伸至馬路上的攤販。
攝影：傅裕



▲雙連市場的白色遮陽傘與黑色塑膠布。
攝影：傅裕

灣社會卻對這群人漠視。而菜市場吸收了非常多這樣的轉業人群。並且，台灣社會非常需要傳統市場。以北農蔬果批發市場與新北市肉品市場的數據來看，小承銷人佔了六成。社區形菜市場仍是台灣採買日常形態的主流。甚至在中上游的屠宰與批發商中也有很大的份額。無論是水果交易與溫體豬肉交易，傳統菜市場的小承銷人一直都是交易的大頭。所以超級市場的冷鏈等新形態交易方式一直無法完全轉型。但攤販自己也會不斷地改善市場的環境與狀況，更新「濕技術」，但人們需要去看見他們濕勞動的轉變。

雙連市場的綠地保留議題，其實回應了 Rob Wallace 關於菜市場出現生物安全問題的觀點。正是因為我們並沒有將菜市場的濕勞動與濕共生放在一起看，這兩者並行才會是濕市場能夠避免生物安全問題出現的可行方向。由於台北市攤販精進計劃（2020年起），與中山至雙連的綠地整合「新中山」計劃（2019年起），捷運地上公園的水泥化與縉紳化逼迫到了原本攤販的生存，一方面工程設計將攤販擺攤空間不斷壓縮與驅趕，另一方面公園內的「有趣假日市集」也要求攤販們必須同樣縉紳化。而雙連市場的攤販自治會能夠在各方學界朋友的幫助下反抗與表達自身訴求，從而在政府、工程與民意之間獲得平衡，保留了連結社區環境，台北盆地歷史，以及自己生活在這個環境裡的「濕」樣態，這是十分難得的。

台北市對於攤販線規則的劃立，也成為了規範或就地合法攤商的舉措之一。這也是公權力在其中施做的展現。但這種劃線政治，取代了許多實際應該被解決的社區糾紛。是否真的可以如此簡單讓權力直接介入於基礎設施之上而不去解決實際存在的社會問題，對此仍舊存疑。

訪談：王志弘

閒聊最近

受訪者 王志弘
訪問記錄 姚麗金

城 近期學術進展如何？

王 科技部的計劃已經要收尾了，是三重公園的計畫。我很忙，所以都是劉睿、高郁婷她們去處理。最近可能要收尾了，要開始寫 paper 了。

新的案子也和劉睿有關，寫樹，不知道會不會通過，沒通過她就沒錢了。近年我的科技部案子主要是支持學生寫論文，特別是博士班學生。比較資深的老師做到現在，當初感興趣的題目已經做過一輪，所以很多計畫不一定是自己的興趣，而是可以支持學生的方向和需求。

忙過這一陣，就要開始改學生的碩士論文，改好去投稿期刊。這兩年累計應該有快十篇要改。這也很累，因為學生畢業以後，當初答應要改的，就會跑不見，只好自己改。我覺得有些寫得還不錯，或是對社會有些影響的，覺得還是改一改去投稿比較好。

改有兩個好處，一是加強宣傳，讓城鄉所在學術場域或學術期



刊上曝光率比較高；一是為了精益求精，因為碩士論文寫到最後大家都欲振乏力，或是因為時間不夠，很快地收尾，但其實那些材料都頗有潛力，可以再精煉。不過，因為大部分學生沒興趣繼續念博班，只好老師自己改。這很花時間，而且按台灣慣例，一般老師動手改，都是掛第二作者，所以很多老師也不太願意花這個時間。但城鄉所每年其實有一二十本碩論，有一半還頗有價值去做學術修改和發表。所以，光做這兩件事情其實就差不多了。

城 這學期新開了一門課《土地與社會》，來談談開課感想！

王 (為什麼要開課?) 第一是因為博士生楊宜靜要做土地相關的研究，我的一些特別的課程都是為了學生開的。第二

就是土地很重要，什麼東西都會遇到土地，但城鄉所好像沒有專門談土地的課程。我們有合聘老師像林楨家談交通運輸，有老師在談住宅，黃麗玲的社會住宅，康旻杰、黃舒楣談原住民部落或都市聚落保存，相關議題都有，但好像沒有集中在談土地。我覺得蠻好玩的，閱讀書目我都沒看過，每個禮拜都要讀書。

城 之前聽您談到研究休假，好奇您屆時打算做些什麼？

王 110 學年第二學期開始研究休假，打算做空間與社會理論的研究。為了以後可以寫書。

有些空間與社會理論的議題，比如 David Harvey 空間修補 (spatial fix) 概念的釐清，我不是說過，空間修補應該還有自然修補、文化修補等各式各樣的修補？但是，它到底是可以有專門的一種空間修補，還是說，可以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修補，但每一種修補都有它的空間向度。這可以拓展 David Harvey 的 spatial fix 概念，這是我要做的事。他原來講的空間修補，是第一迴路發生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第二迴路的營造環境要吸收過剩資本，但我覺得不應該只是這樣，因為資本積累的危機有好多種修補方式，包括生產力的提升，或勞動組織的調整等等，這些東西應該都有空間向度，因而修補應該不只是第二迴路的營造環境去彌補第一迴路，而是各式各樣的，從馬克思一直到哈維到其他人講的不同修補方式，都有空間向度，我要寫一篇這個議題。

另外，是結構與行動這個社會科學常常在談的基本關係，像 Giddens 這些學者想要突破結構和行動的二元對立，那麼，空間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我要找幾個特別談論這個議題的學者，大概有三四本書，可以寫一篇 review article。就是這一類蠻抽象無聊的空間與社會理論的研究。

城 為什麼經常晚睡？

因為惡性循環，晚睡就會晚起，晚起就會晚睡。必須每天往前拉一點，才會調回來。有時候忙，就又會往後延。前一陣子一度一兩點睡，最近又變成三點多。但高郁婷都清晨六點才會睡覺，睡到中午。

城 身體有好些嗎？

王 沒有。休假也是順便想要休養。

城 很多研究會把日常瑣事跟非常形而上的概念聯繫在一起，這樣討論的意義在於？

王 很有趣。這樣一般的讀者也會看吧。

城 這天訪談之前，小編還跟著王老師去 7/11 拿了他新買的三大箱書。訪談的時候，他邊拆書，邊回答問題，所以小編就索性請他推薦了其中的幾本。

王 王明珂 (2021)。《毒藥貓理論：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台北：允晨文化。

毒藥貓是王明珂很早以前就發展出來的一個概念，雖然有點類似西方的替罪羔羊，把社區或社群內部的衝突加諸在某個被標定出來的人，特別是女人，毒藥貓指的就是女性。但因為他是從自己的田野材料發展出來，做中國四川、雲南的少數民族研究，這個概念就很具有知識本土化和在地化的企圖。否則的話，就用西方猶太教的替罪羔羊概念就可以了。

陳映芳 (2021)。《秩序與混沌：轉型中國的「社會奇蹟」》。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台大出版中心的新書，黃麗玲老師的好友陳映芳寫的《秩序與混沌：轉型中國的「社會奇蹟」》，試圖用不同方式來談中國的轉型，經濟和政治面的討論，她都覺得不夠，應該回到社會，所以她特別講社會奇蹟，她談論為什麼中國這麼劇烈地快速轉變，社會有很多衝突，但是維持相對穩定。她從中切入去

談跟別人不一樣的中國轉型概念，我覺得很有趣，而且台大還幫她出版。

「秩序與混沌」牽涉到社會人文科學的大哉問，就是秩序或混亂，或是秩序跟變遷，跟結構和行動這組概念可以放在一起來看。

Martin J.S. Rudwick (2021)。《地球深歷史：一段被忽略的地質學革命，一部地球萬物的歷史》(馮奕達譯)。台北：左岸文化。

最近研究自然和生態這種東西，就要多讀環境科學，新出的一本《地球深歷史》，其實就是地球史，地球從誕生到現在的歷史。

Daniel Immerwahr (2021)。《被隱藏的帝國：一部發生於「美國」之外，被忽略的美國史》(林玉菁譯)。台北：臉譜。

美國其實有非常多的海外領土，不管是託管地，還是屬地，比如說像關島，或是加勒比海的某些小島，甚至包括古巴有一塊關塔那摩灣其實是屬於美國的。一般在談美國的時候，都忽略了它其實有非常多的海外屬地。所以，這本書是專門講美國之外的美國史。

Robin Wall Kimmerer (2020)。《三千分之一的森林：微觀苔蘚，找回我們曾與自然共享的語言》(賴彥如譯)。台北：漫遊者文化。

這本特別值得介紹，《三千分之一的森林》是講一個微小的植物，苔蘚，譯者是城鄉所的畢業生賴彥如。她已經翻了好幾本書，包括《如何謀殺一座城市》《合作住宅指南》《城市造反》，都是城鄉所專業的書，但這一回她去翻譯了苔蘚的書，我覺得很有趣，這也是自然書寫閱讀。

郭慧英 (2021)。《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 (1914-1941)》。台北：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

至於這本，因為現在有很多重新理解中國的專書，這本的特別之處在於，從南洋、華南、包括華僑的角度理解中國，展現清中葉以後建立和中國的關係。這是一個歷史研究，一直講到一九四零年代。那個時候中華民國成

立了，但是他們不在中華民國之內，所以是中華民國之外的華人。沒有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只寫到 1940 年代抗戰的時候就結束了。

在論文方面進度很慢，有什麼好辦法嗎？

沒有。因為幾十年來城鄉所都是這樣。其實原因很簡單，台灣的學生如果去歐美日唸書，其實大多非常的快，像英國，因為制度問題，我們現在已經有好多三年就可以讀完回來的博士，遑論碩士只有一年或一年半。答案很簡單，因為貴的要命，學費和生活費實在太貴了。那你想，在台灣這個環境裡面，學費本地生一個學期了不起五萬元（私立才五萬元，公立要不了那麼多錢），生活費也還好，自己打工，加上家裡給一點，所以說非常自在啊。也就是說，在大學或研究所這個階段多愉快啊，所有畢業去工作的人都累的要命，根本沒有時間做其他事情。所以，學生可能沒有很大的動力脫離這種優游自在的階段。假使我們把學費弄成和美國一樣貴，大家就會很快畢業。

城
王

近期演講活動——

文化治理研究論壇 - 台灣文化治理研究的十年路
線辯證 (2011-2021)

2021/04/01 ·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藝術管理與
文化政治研究所

與王大閱書軒合作為期六個月“城市新視界”閱
讀沙龍

詳情可參考活動頁面：

[https://www.face-
book.com/events/537904637182816/](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37904637182816/)

以地方為基礎的
鄉村教育行動可持續發展研究：
台大知識緣與
坪林的十年陪伴關係¹

受訪者 張聖琳
訪問記錄 傅裕

訪談：張聖琳
「地方與知識緣」



前不久聖琳老師新發表了文章《以地方為基礎的鄉村教育行動可持續發展研究：台大知識緣與坪林的 10 年陪伴關係》，以及未來大學關於時間銀行項目的 app 上線。這兩個項目都是所裡比較特別的地方發展研究。今天我們想要和老師聊聊這兩個項目的發展歷程與研究之間的一些感觸心得等。

首先我們想問問老師對坪林的關注是為什麼開始的呢？又是為什麼在十年之間研究方向從最初偏重產業、特別是茶葉到現在比較偏重地方學校和教育的發展呢？

最早是因為有坪林的學生需要幫忙，想要做有關茶的相關研究，才開始去關注這塊地區，才有了後來的實習課。但要說研究方向的轉變，不如說是一個演化的過程。鄉村發展的問題，

我們更想去尋找真正的痛點。那這個痛點，在一開始覺得好像是地方產業，但深入地方之後，最終覺得問題出在地方教育。

教育才是最基本的問題所在。自 2009 年我從美國回到亞洲，也開始進入台灣與大陸的鄉村，發現孩子一定都會跟著學校移動。一旦村子裡沒有了學校，他們一定會為了去上學而離開。從鄉村到縣城，再從縣城到城市。這是結構決定了年輕人一定會離開鄉村。所以從兩個脈絡來講，2009 年我在日本淡路島做訪問學者的時候就開始關注台灣的農村的一些相關政策。比如那時候的漂鳥計劃，我就覺得我們的農村政策畫了非常多經費想要讓年輕知識分子回到鄉村。但政策並沒有去思考在當地的教育上下手來做人才養成。

我們在坪林的田野最開始進入的時候是在

1. A Place-Based Pedagogical Action Study to Enrich Rural Sustainability: Knowledge Tie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10-Year Partnership with Pinglin, Sustainability 2021, 13, 2916.

2011年，看上去像是從茶的產業開始，但事實上當地茶農真正接受我們台大的學生，是因為我們開始當他們的家教。2012年秋的時候，我們開始嘗試招募小老師去茶農的家裡做1對1的家教。當然這樣的客製化家教服務其實我們並不能長久的去維持，但茶農們真的非常喜歡也非常需要。後來我們就開始和長老教會合作，開始開展課輔班。



城 這裡我有點好奇，要開始做去茶農家裡做家教，是出於什麼願景去做的呢？是發覺他們的勞作日程缺少帶小孩的時間來進行幫助，還是有想過要從教育面向來切入做鄉村發展議題？這個設想會和茶產業有什麼連接嗎？比如技藝傳承之類的。

張 沒有那麼複雜哦。其實單純是因為地區教育資源缺乏，但我們正好有教育資源。我們要回到初衷，我們真正希望的是鄉村它有生命力。但鄉村需要有生命力，它不一定要做茶。我們需要有一個切入點，但這個切入點並不一定產業。最開始的時候從產業切入，確實是因為我們看到了他們的茶產業缺少包裝與設計，缺少販售等等的升級，而我們也許在這些方面幫得上忙。但說實話這些事情我們也並不是真正的專業者，說到底我們並不會製茶。

要相比時間銀行的大溪的脈絡，在大溪我們與到的是高中生，在坪林我們遇到的更多是小學生。坪林並沒有高中，而其大眾運輸也確實非常缺乏。青少年很難每天去花費三四個小時通勤念高中。所以欠缺公共運輸結構性將青少年推離坪林茶鄉的老家。

所以我們看起來從產業切入卻最終轉向教育，其實是一脈相承的發展過程。產業是他們父母的需要，但他們父母更需要小孩子會有未來。這是華人社會的常態。

城 那城鄉所學長們創立山不枯去幫助坪林茶園經營，一直營業到現在，這部分有和坪林的教育研究有什麼相關的鏈接嗎？在老師的文章中也

有提到教育的社會再生與生態協作等社會設計項目，這部分會和當地企業與產業相鏈接嗎？還是這是完全脫鉤的？

張 這是完全脫鉤的。我們在這十年之間不斷地嘗試，思考事情要如何去運行的時候，就會發現我們需要更多更細緻的分工。像山不枯這樣的小公司，無法支持除了賣茶以外的事情。任何一個產業的核心，都是讓自己活下去。連自己都是苦苦支撐，又憑什麼去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等等事情。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生態系，其中的行動者各司其職。有人有團隊有人才去做教育方面的事情，而不同的青創團隊去做產業的開發創新，科學家研究者去做自己的相關研究，這才會都能做得好。對我來說坪林模式是一個以台大師生的知識網絡『品牌化』的一個地方。我們從地方經濟開始撬動這一切，由此被大家看見，這之後真正在做的，是引入各種人才資源慢慢滲透到需要的地方。我們其實也沒有在刻意找人，更像是遇到了對的人。讓有興趣的人在這裡發現他們想要做的、感興趣的事情。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盡力去支持他們可以在這個地方開始。

除了科學、教育等等方面，也有文化相關事情在推動。比如說蔡佳芬老師，她是耶魯大學音



▲2019年聖琳老師與Mike Robinson老師合作的地景認同課在坪林

樂學院畢業的國際知名長笛演奏家，而她也對地方感興趣，於是就帶著學生去把頻臨絕種的相褒歌（2012年只剩下4位90歲以上老人家會唱）重新發掘、重新編曲、加入新的元素等等，最終入圍金曲獎。這確實是文化的創新。但這些都不是我們城鄉所團隊自身能做到的事情。

在這個模式的不斷嘗試中，有一件事情確實對我影響很大。在2017年初我去淘寶村考察的時候，我對於阿里巴巴公司對於如何創造一個平台這件事感觸非常深。馬雲當時有一個口號，是“阿里巴巴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句話讓我非常震撼。無論最終馬雲作為一個企業如何壟斷資本與斂財，他都確實創造出了一個非常改變商業運作模式的開放平台。資本家可以這樣運作，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呢？

在以前的田野模式裡，通常先進入田野和地方建立關係的行動者，會以一種守門員的心態在看待自己與地方的關係，檢視後來進入地方的行動者。但為什麼不是去支持讓所有想來的人都可以來，而是因為我們先在這裡開始運作，就可以對後面想來的人去評價和影響。馬雲的話『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真是把我一棒子打醒。鄉村已經如此缺乏資源，每一個小小的團隊都堅持的如此艱難，我們之間還要去互相

評判誰比較純正誰的做法更優秀合適，那鄉村如何才能發展到具有生命與活力？

所以那之後，我就和我們的團隊說，我們應該去做一個平台，應該去支持任何有興趣進來我們場域的老師和團隊們可以進來開課。我們可以提供各種資料、場所、人力等等幫助去做場域教學，並且能夠手把手去幫助他們與場域磨合發展。所以我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讓每一個有意願來的老師找到他們的舞台，而我們成為他們的後台。所以在整個坪林模式的發展過程中，我的心態確實有一個很大的轉變。任何一個事情要成事，重點就是要把生態系做起來。所以我們用最大的耐心和無限的樂觀，去對待每一個想要來嘗試的年輕人，讓他們能夠對地方有一點點的热情與興趣。他們並不一定要蹲點在這裡，（當然也並不能要求年輕人在一個地方蹲點）只要是對地方有興趣與熱情，都可以加入。

說到蹲點，其實我並不堅持年輕人需要去蹲點在地方。畢竟我當年就是想要去世界到處走走到處看看，所以也不能去要求年輕人對某個土地報以極大的恆心蹲點下來。而且就算我們要求一個年輕人去蹲點在地方，他五年之後也會失去競爭力與活力。那這之後呢？引入新的年輕人來蹲點嗎？所以生態系應該是，讓願意蹲

點的人就算蹲點了，也有新的活水進來。不想蹲點的人，他任何時候想來，都能找到一個對的位置來做一點點小小的貢獻。

這也是當時我不會想到的想法轉變吧。我們在做這些的時候，誠實很重要。當你對一件事情已經疲倦的時候，就不要堅持扛在那裡。這樣不會有什麼新的發展，也許還會擋到別人的路。

城 了解了。那麼老師怎麼看待地方創生這個概念呢？

張 本身地方創生就是我們從日本借來的概念，但我們在討論的地方創生和日本的概念又有些不同。地方創生不同於社造，是真的需要去創業。這是生計的問題，並不是一個浪漫的概念。也因此我們山不枯在 2018 年有了一個大轉型。我們的學生光憑藉滿腔熱血已經無法去支持商業運作需要轉型的方向。公司一定需要商業化，不然光靠情懷和理想是無法生存的。所以以商業發展的生計為主的地方創生，已經和社造的做社區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戰場了。這也是城鄉所並沒有在教的內容。所以做社區和做地方創生，是完全兩碼事。地方創生的生，是生計的生，有了生計才會有生命和生活。有了生計才會讓鄉村重新有人氣。日本很多成功的地方創生案例，最開始撬動的其實不是社區，而是銀行。資金才是創業的最重要的難題。

我在過去十年裡也是不斷去理解這件事情。城鄉所的專業其實是一個規劃專業，所以會希望學生們在進入社區的時候能夠去服務社區。可是事實上學生不見得真的都對這個有興趣，或說他們還不知道要如何對此有興趣。所以後來在創新社區設計這門課裡，我覺得需要去讓學生自己發現自己的興趣，先喜歡這地方，再去思考社區需求以及我們能做什麼。一開始並不需要你去幹嘛。我們其實在設計我們和社區的關係，而不是我們要來服務什麼。一群對鄉村完全不了解的學生，如何才能服務鄉村？學生和老師其實都並沒有能力去做那麼多事情。

一個地方是否能夠做成事，還是取決於當地人

的主動性。如果他們沒有動起來的意願，我們做的一起事情都不會有根基。只有當地人願意在大家的支持之中把後台撐起來，前台的事情才會發生。也就是如果沒有一個平台能夠讓這些自發的能量開始運行，那麼是不會有持續發展的可能的。

所以回到前面講的，為什麼我從具體的規劃設計方向開始轉向偏好去做平台的建立，也是因為我不再去幻想因為我們是社區專業，就要來服務社區。專業是有邊界的，而社區是很大的生活網絡。它有非常多的需要，但這些需要不見得是城鄉所有教過的，或是城鄉所擅長的。所以我們為何不去打開資源的渠道，能夠讓各種需求能夠彼此碰撞。這也是我這十年來在鄉村裡具體看到他們的需求不斷做出的改變。具體設計在鄉村已經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幫助了，要設計什麼呢？人都不在了。但要人在，我們需要設計的其實是社會關係。

而具體我們要怎麼去設計社會關係？目前我覺得教育是這其中的一個關鍵。尤其是高中階段的這些在地年輕人，這些偏鄉青年只要有去培養去引導，給他們足夠的教育資源，每一個人都有非常強的創造力與生命力。這些從地方培養出來的人才，才是最終一定會回到地方的人。我覺得真正的地方創生應該是這樣。

訪談：陳良治

從產業群聚演化到後進產業者的品質追求

受訪者 陳良治
訪問記錄 姚麗金



城 距離上次訪談時隔一年，想知道您近期的研究進展。

陳 過去的研究在談台灣的產業和產業群聚，討論這些產業群聚怎麼在台灣發展起來。比如在台中、高雄、桃園、新竹，都有不同產業聚在那個地方，那我就在談這些產業為什麼聚在那邊，這些產業聚在那邊對這個產業後來的發展帶來了什麼影響。台灣有很多產業，而且大多是中小企業，在世界上具有所謂的競爭力，我的研究想去強調這群中小企業能在世界市場上跟那些大公司競爭，他們的競爭力來自他們聚在那個地方帶來的好處。這是 2010 年之前的事情。

現在，台灣的產業在世界上碰到一些瓶頸，面臨更嚴苛的競爭，亟需產業轉型創新。面對新的需求，聚集在不同地方的產業群聚的空間結構也會發生轉變。

像我以前在研究台灣的機械業，現在在談幾個台灣的電子業。台灣的電子產業大多集中在新竹科學園區，這就是我剛講的一種產業群聚形態。面臨不斷更新的技術和市場競爭的變化，台灣的新竹科技園區也在變：裡面的廠商跑到大陸進行投資，開始變大，已經不見得是當初研究的中小企業，產業結構發生變化，甚至發展的技術也產生變化。以前都說台灣就是在跟著全世界，而現在有些廠商已經在全世界領先。

台灣現在開始也有一些新的產業出來，比如說離岸風電。照我以前的認知，台灣的產業要發展起來，都是希望通過群聚，那麼，最近才冒出來的產業會不會也呈現某種群聚形態？

這就是我最近的研究，也是近三年的科技部計畫（「理解產業群聚演化：多重軌跡、時間及制度」(2018.08-2021.07)），談論新的產業需求下，台灣的產業群聚和空間形態轉變，以及造成這些轉變的原因。

城 最近的研究成果或特別的發表？

陳 我之前有做過台灣製酒業的發展研究，關注台灣的威士忌、葡萄酒，以及各種具有在地特色的酒，是如何在不同地方被開發出來的。

不曉得你們喝不喝葡萄酒，一般喜歡喝葡萄酒的人習慣用新世界和舊世界來區分葡萄酒。舊世界的葡萄酒強調地方風土，這裡的風土不只是天然條件，還包含地方長期積累下來的酒釀造功法，像法國、意大利、德國，他們講我們這邊的風土得天獨厚，得益於上天給我們的恩賜，才能夠做出好酒，其他地方無法取代。後來又出現所謂的新世界，就像美國、南非、智利這些，他們就很強調，是沒錯，你們歐洲有你們的風土，但是我們有我們的技術。像美國，就通過技術方面的投資，包括葡萄品種和釀造功法的改善，再加上很厲害的行銷，來提升葡萄酒的品質和聲譽。

台灣的葡萄酒在全世界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對比下來，我發現台灣的葡萄酒沒有非常優越的風土條件。台灣做葡萄酒都是在中部，特別是彰化一帶，那裡高溫，潮濕，又容易下雨，

葡萄不容易長的很成熟，我們的葡萄品種又很詭異，但是我們也做出一些酒，而且這些酒可以賣得出去還不便宜。所以，我的研究就要嘗試去討論，為什麼大家都覺得這個不適合做葡萄酒的地方做出這麼多葡萄酒，而且有些葡萄酒還能在市場上用高價賣出去，那這個葡萄酒的價值或品質該怎麼被斷定？照剛剛講的，不管是按照歐洲、還是美洲的標準，台灣的酒應該是低價酒，可是我就要討論說，為什麼這些台灣葡萄酒還是有機會的被定位在一個還不錯的品質位階上。

我過去幾年發表了幾篇文章，有一篇是跟一位美國學者合作，他說其實不止台灣，日本甲州葡萄酒也是這個狀況，因為大家不覺得日本的葡萄酒很厲害，或者日本的葡萄品種很特別。所以，我們想做比較研究，討論台灣和日本的葡萄酒產業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被發展起來。最近則又另一篇文章進一步討論，面對全球葡萄酒業的主流品質觀點，台灣的葡萄酒品質如何被建構及理解。

Chen, Liang-Chih, "The pursuit of qualities by peripheral latecomers in the agrofood sectors: The case of Erlin wine industry in Taiwan," *Sociologia Ruralis*. [SSCI] (Accepted and in production) <https://doi.org/10.1111/soru.12336>

Chen, Liang-Chih and Aaron Kingsbury, 2019, "Development of wine industries in the New-New World: Case studies of wine regions in Taiwan and Japa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72, 104-115. [SSCI]

城 得出結論了嗎？如何定義「品質」這個詞？

陳 品質是一個社會建構概念。像我們的手機、車子，那個品質比較容易斷定。舉例來說，手機就是通訊好啊，小啊，或輕啊，或者說穩定，這些都是公認的。比較大的差別就是美感，iPhone 為什麼賣得比別的手機貴？一種說法是，iPhone 做得比較穩定，可是一些 android 手機做得也很穩定啊，為什麼相同標準下 iPhone 就會賣得比較貴？他們說

iPhone 的品質比較好，那這個品質指的是什麼？有人說是 iPhone 的收訊比較好，或是外觀比較漂亮。那這個漂亮是怎麼被界定出來的？我們說這是一種社會建構，就 iPhone 這個例子而言，所謂的品質指的是美感上面的品質。

評判葡萄酒的品質，也是如此。我們說，品質是一種社會建構，這個品質怎麼被決定出來，總還是要依據幾個特質：

一種是國家的工業化或產業化標準，食品安全方面的標準。

一種是市場標準。首先要看東西便宜或貴，我為什麼會買這個東西，因為相同品質條件下，它的價格比較低；再來，現在越來越多農食品開始強調在地風土，這個東西為什麼品質好，因為它是我們台灣種出來的，種植和製作過程中隱含了很多台灣在地文化和過去的慣習；第三是要看產品背後的倫理或生態價值，為什麼花大錢買，是因為生產種植過程沒有剝削勞力，沒有破壞環境、土地等等。

我們通過各種標準說這個東西的品質是好的。但是，農食品還有一個特殊指標是看誰種、看誰作。比如，這個農夫他用了特殊的工法，他就兢兢業業，每天都在做這件事，他 inspire 了我，有為者，亦若是。

簡單從剛剛這幾個案例來看，就會發現，你要定義台灣的葡萄酒或農產品品質就可以這麼來看。如果你要遵循產業標準的話，就可以大量生產，至少生產過程中可以把變因排除，生吃不會拉肚子，而且品質都很一致，所以很多農食品可以大量生產，可以賣到國外去。但是，如果你更在意的是風土，就想辦法強調這是在本地做的，而且它的製作過程參雜了很多本地的歷史文化社會因素，或者說，現在推生機食品，就說這個產品不危害生態等等。

那我的研究是說，台灣後來做出來的這些葡萄酒，它的市場價值很難和國外拼，可是，我們可以從在地風土、生態環境出發，或者我們叫「啟發」，農民投入心力去感動別人，這幾個角度來定義它的品質或行銷方式。

通過這個研究，我要強調的是，很多農產品業面對全球化競爭，為了吸引國外投資，都投入了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但是，對不起哦，我們台灣的案例講出另外一種農村的產業發展方式，這個過程不必然要大資本，或大規模生產。這些是我的研究提供的一些啟發。

城 聊聊最近的教學工作！

陳 我的教學就比較沒有什麼變化。我的課在城鄉所被歸類為空間的經濟分析，例如開《都市及區域經濟發展概論》這門課。下學期則是區域發展專題的課，跟我自己的研究專長有關吧。另外，還有去地理系開《經濟地理》，跟國發所的張國輝老師開一個《國家理論》的課。還有就是開實習課嘛。

我在城鄉所開的課本來就有一些外系所的同學來聽，但是經濟地理、國家理論我是主動跑去外系所開課，有機會更多的接觸到不同系所的學生。

城 輾轉於多個系所教學，您覺得不同系所或不同系所的同學之間有什麼不同的特質？

陳 舉例來講，有很多大學部的學生來修《經濟地理》，以我在課上的經驗，台大大學部的學生的程度的確是不錯，大家都很積極，他們的表現其實不輸給我們城鄉所的這些學長姐，雖然他們是大學部。所以，城鄉所的學長姐反而要警惕一下。

國發所和我們一樣也是異質，只是我們更在意我們討論的課程當中的議題，怎麼和真實世界結合在一起。國發所他們會談論比較高的國家政策，比較 top-down，城鄉所比較在意地方、bottom-up 的反應是什麼。

城 實習課必須加入話題！這學期的實習課進展如何？

陳 實習課的問題一直都存在啦。不管是實習課的

分組方式，參與做法，還是實習課的成果，一直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老師們也在嘗試，在城鄉所脈絡下，比較適合的實習課的設計。我之前談過，實際上城鄉所的實習課有基本的理念，這個課希望有不同背景的同學 teamwork 在一起，做實際的真實的事情，不是在教室裡操作我們自己想像出來的議題，而是有實際的田野，再來是強調參與過程。一直是有這些基本的想法。只是說這些想法如何在課堂上讓同學有完整體驗。

舉例來講，我相信你們都體會到了與不同背景的同學合作，第二個，你們也希望能做真實的案子，涉及的議題社區 / 地方是有意識的，願意和你一起做，那才真嘛，如果這個議題是我們自己想的，那根本沒有人理你嘛，所以，在操作實習課的一年當中，你如何想辦法讓這件事情變真，這個『真』不是我們想像出來的，而是地方的 stakeholders 覺得重要。我相信，你們過去的操作都能讓你們意識到，怎麼去讓真實的議題能夠產生。第三個，參與式過程，這個就比較麻煩，你要讓人家願意參與，就必須要讓人家認同你的議題，對你信任，而且有時間，也願意參與，還要找到好的參與方式。可是，情況常常是，我們把議題弄出來，學期就已經結束了。有些同學覺得自己在實習課的操作過程中只是在參與式規劃的前階段，只是和 stakeholders 對某個議題產生共識，就結束了。這個狀態下，同學就會有些抱怨。有些同學運氣好，他們就有辦法操作到比較後端，可是有些同學還在前端，一年就結束了。有些同學就要開始問，想像中應該是要有個成果，但最後就是攪在社區裡面，搞不好議題也不確定，就只是和社區攪來攪去。這是實習課一直存在的狀況。

但這個學期的實習課就存在一些改變。我們延續 R07 的議題，議題一開始就比較確定，我們與社區已經確立了一定程度的關係。同學有很多時間去操作後續的參與式規劃設計。可這樣同學們可能又有其他意見，他就會覺得說，我為什麼要做這個議題？像你們以前，議題是自己長出來的，可這學期的狀況就會是，這些議題不是我們自己選的，都是學長或者老師幫

我們挑的，同學們不見得認同這個議題。我光議題都不認同了，還要去後面的參與，就會有些意見。對我們來說，這就出現另外一種狀況。

實習課要在一年內完成操作，要滿足我剛剛講的幾個基本的概念，我們覺得有點頭痛，又很想堅持，但是一直在想辦法找到一種好的方式，這也是實習課改革小組一直在開會，一直在想的原因。

城 分享一些擔任所長的日常？

陳 我是去年（2020 年）八月一號上任。上任已經半年多了。當所長會有很多行政方面的事情，佔掉平常準備教學或研究的時間，這是每個當所長或接行政職的人都有意識到的，這沒什麼好抱怨的，這本來就是日常，反而提醒我要更有效率地把另外兩件事做好。對我比較大的挑戰除了時間管理之外，是提醒我自己讓我自己趕快熟悉所長該做的業務。

以前當老師我就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城鄉所有什麼政策或想法我去配合。所長的角度變得不是這樣，我自己要比其他老師有更清楚或思考說接下來城鄉所的所務運作和方向是什麼，要從上位的角度去想城鄉所的未來，或接下來的問題是什麼，要怎麼辦。假如說有一個城鄉所的未來方向，這個方向不是所長說了就算，還必須要和老師討論，形成一種溝通與共識。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搞清楚例行的業務。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要補齊行政人力，讓所務能夠順利運作。很幸運的是，補到了一位技士。我們所還缺老師，得想辦法處理新聘老師的事情，也還好，很順利聘到了一些老師。

第三件事，你們大概也知道，就是我們今年四月的所務評鑑。每六年要有一次，這是城鄉所的大事。要做所務評鑑的所有的工作，包括要撰寫所務評鑑的報告書，這是一個大工程。不過還不錯，我們在三月把這個大工程做完了。接下來就是要看怎麼去面對四月的所務評鑑。

另外還有一件大事是年底要開始的所上的空間規劃。公館的空間要全部搬回來，要對工綜新館落成後可以被分配到的新的空間進行規劃，滿足城鄉所師生在教學研究方面的需求。這些空間搬進來必須要進行整修，那整修經費要怎麼去募款，除了內部消化之外，怎麼去爭取來自校方或其他管道的資源，這是之後面臨的比較大的挑戰。這是上任半年多來主要在做的事。

隔壁工綜新館本來預計今年暑假前就要完工，但是如果照目前的進度，應該是今年底、明年初可能要開始啟動。

城 想請您談談如何在忙碌中兼顧效率？

陳 不曉得大家如何看待效率，因為有時候在城鄉所談效率，好像有正反面的看法。一般評價一個人做事情的好壞，就是看他效率高不高嘛，但是似乎也不是那麼理想。效率表示用最有效的方式達到某個目標，為了追求效率的話，就是趕快確定一個目標，然後用最簡單的方式去把它達成。但是有時候要把事情做好，好像這個目標必須要多做討論吧，如果單純講求效率的話，想一件事情就是趕快把目標確定，其他可能性就消失了，甚至也因為效率，你用最快的方式把它達成，但是也有人會說，不對啊，完成一件事有很多種方法，地方發展的多重性可能就會消失，就不討論了，可能我們城鄉所在意的是不同方案都能夠產生。

除了目標的多元性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消失之外，達到這個目標的做法的多元性也會消失。因為你只是採取一種方式。所以，在城鄉所討論效率這件事，有的人常常會認為是一種負面，為了效率來做事情，可能會排除很多事情的可能性。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是，可能本來我們做事就很沒有效率。就算我們有一個共同目標了，可是我們不能有效率地去把事情做完。我們不能合理化我們做得比別人慢，或做得比較久，東西做出來不夠成熟。我們還是要談正效率。不能說人家要求你提供什麼東西出來，我們說不行哦，我們要很久才能做出來，這在行政上是

不能接受的。所以擔任所長之後，想辦法改善我們做事情的效率不張的問題，這是必要要處理的。

回到我自己身上，在有限的時間內，有很多的事情去做，勢必就會做些取捨。其實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處理方式，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做法，可能會更嚴格要求自己，在什麼時間內把什麼事情做完。

我跟我的學生在談這件事情，我不會說，你要在兩年半或三年的時間裡畢業。但我會說，你想念五年都 ok，但是你要自己清楚你念五年是因為你在做對於你自己有意義的事情。可是，我比較擔心的是同學說他沒有，他在晃。

▼反送中期間，香港出現史無前例、由公務員發起的集會，吸引許多市民參與，將中環遮打花園擠得水洩不通。

攝影&說明/洪與成

